

# F&D

## 金融与发展

2017年6月号

对罗伯特·戈登的采访

第28页

现金怎么了？

第32页

投资减速

第36页



# 千禧一代

## 以及未来的工作

# 目录



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开始在分享经济中寻找出路。

## 千禧一代和未来的工作

- |    |  |    |  |
|----|--|----|--|
| 4  | <b>不确定的未来</b><br>伴随激动人心的新机遇，千禧一代面临着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阻碍<br>莫林·伯克 | 16 | <b>终身教育</b><br>劳动力市场在不断变化，“千禧一代”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并进行调整<br>纳吉瓦·里亚德   |
| 6  | <b>未来的工作</b><br>数字经济将急剧削弱传统的劳资关系<br>阿伦·森达拉拉詹           | 20 | <b>奋起直追</b><br>当今的年轻人不以其父辈的方式创造财富<br>丽莎·德特兰、乔安妮·许          |
| 12 | <b>直言不讳：青年之声</b><br>不断适应，持续调整，并且永远都不要停止学习<br>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 24 | <b>畅所欲言</b><br>千禧一代如何看待他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挑战<br>妮可·布莱恩-基马尼、玛利亚·约万诺维奇 |
| 14 | <b>养老金冲击</b><br>发达经济体的青年一代必须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退休收入保障<br>毛里齐奥·索托 |    |  |





48

## 本期还有

- 32 现金已死，还是现金万岁  
虚拟支付正在快速取代现金支付，但却没有完全取代  
艾伦·惠特利
- 36 投资减速  
自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已经减速  
M.艾汉·科泽、弗兰齐斯卡·L.奥恩佐格、叶蕾
- 40 如果资金不再流动  
有助于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的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在某些国家面临巨大压力  
安德烈亚·阿德里亚诺
- 48 新闻热点的背后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移民对其来源国和目的国都能产生广泛的积极作用  
赫苏斯·冈萨雷斯-加西亚、蒙特福特·姆拉奇拉
- 51 从饥饿到超重  
肥胖和糖尿病是新兴经济体的严重威胁，但可以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有效管理  
爱德华多·J.戈麦斯
- 54 战胜埃博拉  
经济领域的敏捷行动是克服埃博拉危机的关键  
穆罕默德·坎古尔、卡洛·卓勒维齐、因德吉特·希恩

51



## 其他内容

- 28 经济学人物  
悲观的预言家  
克里斯·韦利斯采访罗伯特·J. 戈登——戈登认为技术创新减速会损害经济发展
- 44 图表释义  
为改革加油助力  
虽然能源补贴改革面临挑战，但很多国家仍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  
玛利亚·约瓦诺维奇
- 46 前沿  
机会窗口  
莱谢克·巴塞罗维奇解释为什么在当公民愿意接受变化的时候迅速采取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 58 书评  
《贸易壁垒：移民及对全球化的评论》，玛格丽特·E.彼得斯  
《第一个严肃的乐观主义者：阿瑟·塞西尔·庇古与福利经济学的诞生》，伊恩·库梅卡瓦
- 60 货币  
漂亮的比索  
哥伦比亚在其最新的货币上展示了该国丰富的文化  
娜迪亚·萨贝



28

英文版刊号 ISSN 0015-1947

主编

Camilla Lund Andersen

责任编辑

Marina Primorac

高级编辑

Gita Bhatt

James L. Rowe, Jr.

Jacqueline Deslauriers

Rani Vedurumudi

Natalie Ramirez-Djumen

Chris Wellisz

Nagwa Riad

在线编辑

Marie Boursiquot

助理编辑

Bob Ahmed

Bruce Edwards

Eszter Balázs

Maria Jovanović

Nicole Braynen-Kimani

Nadya Saber

Maureen Burke

印刷/网络产品专员

Lijun Li

编辑助理

Suzanne Alavi

Aisha Shaikh

文字编辑

Lucy Morales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Thomas Helbling

Celine Allard

Tommaso Mancini Griffoli

Bas Bakker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Steven Barnett

Inci Otker-Robe

Nicoletta Batini

Laura Papi

Helge Berger

Catriona Purfield

Paul Cashin

Uma Ramakrishnan

Adrienne Cheasty

Abdelhak Senhadji

Luis Cubeddu

Alison Stuart

Alfredo Cuevas

欲知广告事宜，请与IMF出版部联系。

地址：700 Nineteen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623-7430

传真：(202)623-7201

电子邮件：publications@imf.org

©版权所有，IMF，2017年。翻印本刊文章

应向主编提出申请。地址：

Finance &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202) 623-8300

传真：(202) 623-6149

网址：<http://www.imf.org/fandd>

本刊对非经济目的的翻印一般会迅速免费予准。

本刊的文章及其他材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88190916

传真：88190916

邮政编码：100142

网址：<http://www.cfeph.cn>

中文版刊号：ISSN 0256-2561



# 未来的 工作场所

此时似乎是一个合适的时间推出我们改版后的杂志，本期杂志的封面是关于千禧一代和未来的工作。虽然《金融与发展》在版面设计等外在方面进行了改版，但内容方面并未有何大的改动。年轻的成年人可能不得不出一些根本性的调整，以使其与未来的工作场所的要求保持步调一致。

首先，工作性质本身正在发生改变。婴儿潮一代和 X 一代大都能找到常规的全职工作并享受相应的福利（例如带薪假期和慷慨的退休金），但如今的年轻人要找到这样的工作却要难很多，转而在所谓的“共享经济”领域工作。据纽约大学的桑达拉拉扬教授的研究，在美国约有 40% 的自由职业者是千禧一代。

其次，千禧一代进入职场的时机非常糟糕，他们在继业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开始步入职场。在很多国家，其青年失业人口高达其劳动力大军人口的 20%，并持续维持在高位。

此外，科技对于千禧一代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经济已创造了数百万的新工作岗位，但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可能会很快代替人类的部分活动，诸如开车、提供医疗卫生服务以及法律咨询。

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就此采访了全世界的千禧一代。其中，来自中国的凯西·龚对此持乐观态度——她拥有强烈的创造一个更美好社会的决心——而这驱动着很多千禧一代青年。她说，“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因为他们是创造力的核心组成群体，是突破性创新的背后力量，是更公平社会的倡导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引擎。” X 一代和婴儿潮一代人，请你们让路吧。FD

卡米拉·伦德·安德森（CAMILLA LUND ANDERSEN），主编



## 本期封面

迈克尔·瓦拉卡萨（Michael Waraksa）以其有关植物和动物学方面的抽象拼贴画闻名。10 年来，《金融与发展》杂志首次进行改版。在本期杂志的封面上，瓦拉卡萨将千禧一代描绘成蝴蝶，在变化的工作场所中探索未来。





“如今大家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想要理解财政政策就要理解经济学和政治。本书的价值就在于其根植于政治经济学，内容涵盖了一系列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都感兴趣的重要话题。”

——蒂莫西·J. 贝斯雷 (Timothy J. Besley),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如果不考虑财政政策背后的政治因素，那么你就不可能明白财政政策。本书将帮助你理解这一复杂的领域。在此方面，本书作出了卓越而广泛的贡献。”

——阿尔贝托·阿勒希纳 (Alberto Alesina), 哈佛大学教授


40 美元，英文，©2017，548 页，平装，ISBN 978-1-47554-790-0，Stock#FP2016EA

在 [bookstore.imf.org/fd617B](http://bookstore.imf.org/fd617B) 上订购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不确定的未来

伴随激动人心的新机遇，千禧一代面临着一系列完全不同的阻碍

莫林·伯克

千禧一代在这个经历科技变革和经济遭遇巨大破坏的时期开始逐渐步入职场。这些因素影响着他们的选择和经历——反过来，这一代人也在影响着全球经济。

出生于1980—2000年的千禧一代是近代时期人口最多的一代人。如果说之前的婴儿潮一代和X一代人是数字时代的移民的话，那么千禧一代则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了，他们对最新的科技有着本能一样的敏锐触觉。科技对于他们而言是第二天性——然而，很多人却在担心未来他们的工作将被机器人所取代。

促进和沟通买卖双方的数字平台的兴起使分享经济成为可能，而越来越多的千禧一代开始在分享经济中寻找出路。诸如当优步、来福车司机这样的分享经济领域的工作使一些千禧一代能养家糊口，虽然这类临时工作远不能和有传统的退休金计划以及其他那些父辈们通常享有的福利的全职工作相提并论。

这一代人也同样热衷于分享经济的服务，这使得人们能享用从床到车、船等几乎所有的东西，而不用为拥有这些东西而烦恼。千禧一代不愿意花大价钱去购买车和房子，他们的消费习惯与前几代人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难道是因为放弃了物质主义——或者这仅

是资源不足的表现？或者两者皆有之？虽然年轻人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但他们仍在为获得工作而挣扎和努力。如今，年轻人的平均收入比1975年时的水平要低，至少在美国情况是这样的。美国人口统计局的资料显示，美国年轻人的（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收入比40年前要低5.5%。

千禧一代在通往繁荣之路上阻碍重重，而这一情况是他们的父辈所不曾遇到的。与前几代人相比，他们接受了更好的教育，但这并不足以保证他们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在其职业生涯中多次转换工作或转行。正规的学校教育仍是学习的主要途径，教育系统应确保千禧一代及其后代获得未来新出现的工作所必需的一系列技能。

不管未来的工作将会是什么样的，这一代人仍将继续从事现在的工作，而这一时间将比他们想像的还要长。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政府试图控制日益上涨的养老金支出，千禧一代面临着不得不延迟退休并更多地进行储蓄以维持当今退休人员的生活水平的局面。

本期《金融与发展》研究了千禧一代所面临的经济机遇与挑战。他们这一代人将在一个与其父辈所生活时代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中谋生。FD

莫林·伯克 (MAUREEN BURKE)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图: SHUTTERSTOCK / MAVERICK\_INFANTA



# 未来的工作

## 数字经济将急剧削弱传统的劳资关系

阿伦·森达拉拉詹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未来的工作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确定。

两大数字化力量的共同作用将会快速地重塑未来的工作环境，从而导致劳资关系显著削弱。一方面，新的数字平台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从传统的由组织内部全职员工完成工作转变为由一群个体企业家和按需工作者共同完成工作，让经济活动越来越依靠短期自由职业关系，而不是全职工作。

另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自动化技术在构成今天大部分工作的认知和体力工作方面表现越来越好，预示着将会出现驾驶汽车或管理项目等复杂人类活动的自动化，这也会挑战一系列职业，其中包括法律、咨询、零售、交通等。

### 工作变化

上述两大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将全职工作拆分为各个任务和项目。这可以更容易地用自动化技术资本来替代劳动力和才能，而且这一趋势还会随着工会力量的削弱而强化。

社会和政府必须跟上这些工作安排变化的步伐。要避免让过去 50 年来由资本持续集中所导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我们必须致力于实现群体资本主义，让大多数工作人口从作为才能或劳动力提供者的全职员工转变为实际上的微型企业家，他们拥有极小份额的社会资本。

由于只有少数人会以今天的传统方式工作，

而更多人(或者大多数人)的职业都会发生多次改变,因此也突显了教育变革的必要性(见本期《金融与发展》,“终身教育”)。我们不能继续采用20世纪的教育方式,即主要通过2—4年制的高等教育机构来提供早期教育,社会必须建立健全的教育机构来帮助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期实现工作转型。此外,主要由雇主资助的社会安全网(通常包括医疗保险、带薪休假、工作场所保险、退休金缴款、可以稳定收入的可预测薪资)在未来有更多个体企业家的时代也必须重新思考。

过去两年的几项研究表明了非雇用劳动力的兴起,他们从自由职业中获得主要收入或补充收入。据估计,美国的此类独立工作者人数达到4000万—6800万人(见图1),其中的差异是由于定义和计算方法的不同而造成的。虽然如此,所估计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都表明,独立工作者在美国1.6亿的民用劳动力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而且,年轻人追求非雇用工作的倾向更为明显,例如,根据MBO合伙公司的调查,在通过自由职业获得主要收入的独立工作者中有40%是“千禧一代”,而总体民用劳动力中平均只有1/3是

“千禧一代”。

大量为促进非雇用收入提供便利的数字平台的兴起可能会加快这一趋势。很多此类数字平台促进个人资产的商业化,让其发挥出更大的生产力,其中包括交通平台(如美国的优步和来福车、中国的滴滴出行、法国的BlaBlaCar、印度的Ola和东南亚的Grab),还有爱彼迎等让个人(到2016年年底超过300万人)在家中经营短期商业化住宿业务的数字平台,以及欧洲Drivy和美国Getaround等点对点汽车租赁平台。这些平台中还包括不断增加的按需劳动力和自由职业劳动力平台,比如Upwork,其在全球运营,拥有超过1200万名注册自由职业者,提供包括管理、客服、网站开发、会计等技能服务;此外,还有特定国家的自由职业平台,如日本的Crowd-Works(拥有超过100万名工作者)和南非的Giraffe;以及特定行业的专业劳动力平台,比如管理咨询类平台Catalant、高端软件开发类平台Gigster、法律服务类平台UpCounsel等。

2016年11月,摩根大通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显示了这种变化:在2013年年底,美国成年人中只有0.5%通过此类平台获得非雇用收入,而该比例到2016年中期上升为4%。尽管没有可比的全球估计值,但麦肯锡全球研究所2016年10月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该比例在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和英国也达到4%左右。在未来几年,非雇用工作安排将进一步扩大,因为特定行业的专业劳动力平台激增,因此可能会减少企业的全职工作,并将其转变为项目或任务。这样就会将商业信任来源转向数字系统,提高WorkMarket和SAP等公司所提供的新企业软件的作用,以管理基于任务的复杂的按需 workf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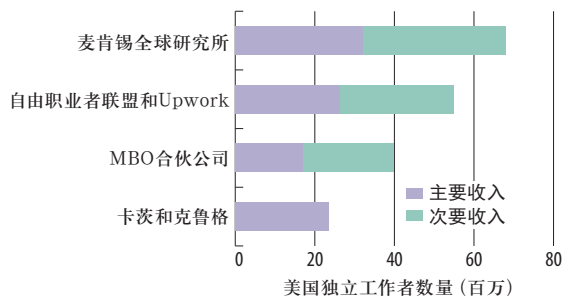
## 第二个机器时代

关于按需技术对全职工作冲击的担忧,因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进步所导致的劳动自动化而进一步恶化。当然,对技术性失业的恐惧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例如在1811年到1816年英国的“卢德劳工骚乱”中,纺织工人就破坏了织布机,因为他们认为织布机会取代其在生产中的作用。

一份由“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全国委员

图1  
独立工作

四项近期研究发现,1.6亿名美国劳动者中的很大一部分通过自由职业获得收入。



资料来源:卡茨、劳伦斯·F.和艾伦·B.克鲁格(Katz, Lawrence F. and Alan B. Krueger), 2016,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2015”(RAND); MBO合伙公司(MBO Partners), 2016, “State of Independence in America” Herndon, VA; 自由职业者联盟和Upwork (Freelancers Union and Upwork), 2016, “Freelancing in America 2016”;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6, “Independent Work: Choice, Necessity, and the Gig Economy”。

注:一般来说,独立工作者从自由职业安排中获得其全部或部分收入,但各项研究中的独立工作者的准确定义各不相同。



会”为美国总统准备的题为《技术与美国经济》的报告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一些人甚至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恐惧，认为技术变革不仅会在不久的将来造成失业的不断增加，而且最终还会消除绝大部分工作，只有少数工作将幸存，因为我们今天的工作中大部分都会由机器来自动地完成。”

但该报告并不是在2016年为奥巴马总统准备的，而是在50年前为约翰逊总统准备的。该报告的预言虽然有点夸大其辞，但还是准确地指出了制造业长期就业流失的根本原因。尽管美国制造业就业在该报告提出之后的十年中持续增长，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达到顶峰，接近2000万个工作岗位，但此后便开始下降。具体来说，1977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非农在册就业人口的22%，而如今该比例还不到10%，约为1200万名就业人口。虽然难以精确地将贸易效应与技术进步分离开来，但很多人都认为，过去15年中的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更多地是由于工厂自动化所造成的，而非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低成本国家。实际上，虽然其就业一直在流失，但美国制造业的产出却一直在增长。而由于机器人技术持续改进，自动化对中国未来就业的冲击将更加严重。2014年，中国的城镇制造业就业人口达到8000万名，数量非常庞大，但是其制造业就业会在未来几十年持平，然后迅速下跌。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相比制造业自动化，更大的冲击来自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迈克菲(Andrew McAfee)在2014年所预测的“第二个机器时代”幽灵，因为技术开始完成认知工作，而认知工作在以前只有人类才能完成。例如，IBM的Watson技术为金融合规、医疗诊断和法律服务提供基于人工智能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多的零售店已经采用自助结账柜台来取代收银员；无人驾驶汽车技术似乎要威胁到全球范围内数千万卡车司机的就业。这些受影响的职业涵盖了所有专业领域，预示着伴随过去几十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高技能工作工资增长会减速，甚至出现下降。而且，很多人还担心，如果机器超越自动化体力劳动，开始满足认知需求，那么留给人类的工作将会非常少。

但是，只要回顾一下自动化替代就业的历史，

就能获得一些参考，并且让人安心。例如，随着美国农业的不断机械化，其农业就业人口比例从1900年的41%降至2000年的不足2%，然而整体经济的失业情况却并没有出现，而基础技术领域的进步反而孕育出了新产业。例如，由于客车取代了马车及其相关产业，汽车产业兴起，而公路、加油站、汽车旅馆、快餐店也随之兴盛(Autor, 2015)。更广泛的观点认为，即使老产业萎缩或消失，满足人类不同愿望和需求的新产业也会随之兴起和发展。例如，医疗保健业在200年以前还不存在，但如今却占了美国就业人口中的12%左右(见图2)；旅游业在1900年还没有形成产业，但在2011年却在全球范围内为2.35亿人提供了就业，占全球就业人口的8%；以前非正式的在家庭或当地社区内进行的活动(如通信、娱乐、旅行、教育、照顾病人)都已经成为正式经济中的产业，并且这一模式已经兴起。

即使老产业萎缩或消失，  
满足人类不同愿望和需求的  
新产业也会随之兴起和  
发展。

随着满足当代社会需求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因新技术而实现自动化，人们得以腾出手来满足以前服务不足的人类愿望或者新的社会需求，而未来急剧增长的可能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活动，也可能是教育活动或者看护经济的正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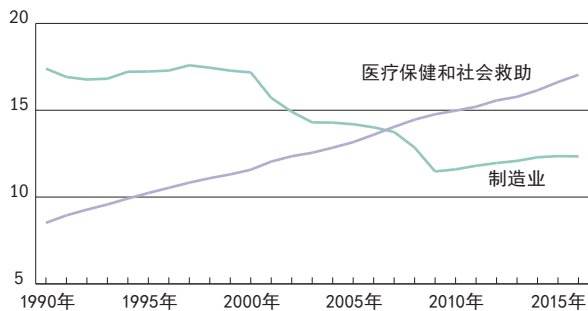
### 群体资本主义

因此，有很多预测认为，如今大部分工作在未来几十年可能都将受到自动化的冲击，但这不会造成广泛和直接的恐慌。不过，在新兴的非雇用工作和不断提高的机器认知能力的共同作用下，社会谋生模式可能需要改变。这是因为，虽然自动化会降低构成工作的不同任务完成成本，但其降低成本的速度有快有慢，从而缓和了自动化的劳动替代效应。而如果组织开始分解工作，并且在按需平台上将任务分包出去，那么在技术准备

图2  
工作的变化

制造业就业人数在过去15年里不断减少，而一个世纪前还几乎不存在的医疗保健业就业却迅速增长。

(百万劳动者)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就绪的情况下，会促进这些任务更快地实现自动化。

改变社会谋生模式的一个解决方案是重新定义我们的基本谋生模式：从拥有与经济活动有关资本的大型组织为劳动力和人才支付薪资转变为混合劳动力、才能和资本投入的微型企业系统，其中一些投入可能由个体企业家自己提供，而另一些则由其他人提供（可能通过按需平台），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所提供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

共享经济和其他专业服务平台的兴起使得群体资本主义未来在大规模上可行。其中最好的例子可能就是爱彼迎，该平台将业主的空余房间与寻求短期住宿者的需求匹配起来，而且很多统计结果都表明，爱彼迎是世界最大的短期住宿提供商。（在2016年12月31日，全球有超过200万人居住在通过爱彼迎提供的房间，而世界上最大的连锁酒店喜达屋—万豪集团的房间数仅为这一数字的大约一半，约110万间。）爱彼迎收集居住需求，提供全球品牌保证，制定并执行了一些标准（几乎就是下一代特许经营），而提供短期住宿的实际业务运营（包括定价、可卖房管理、定位、推广、与顾客互动等）是由300万个房东完成的。此外，房东还通过爱彼迎的声誉系统建设自己的微品牌。

爱彼迎可能就是未来工作的缩影，受自动化的替代效应影响相对较小。在巴西、印度和越南等年轻的、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中，由于机构全职工作还不是很普遍，传统经济机构的效率也千差万别，因此拥有健全数字信任系统的平台可以将服务需求与供应商匹配起来，从而促进自雇者与创业者的发展，让他们能够对接全球市场，通过建立个人资本来提高生活水平。在日本、英国、美国等更成熟的经济体中，虽然现在主要依靠正式的全职工作，但此类平台模式也能维持合理的个人收入水平。从本质上说，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帮助今天的劳动者从劳动力提供者向资本拥有者转型，将劳动力与自动化所导致的较高资本—劳动替代率部分地隔离开来。

今天有抱负的初级律师在未来可能会被通过法律服务平台运营的微型律师事务所所替代。这可以让年轻律师接触到该平台聚集和培育的客户，同时发挥基于人工智能的法律研究能力。另外，微型企业家可能会通过平台运用无人驾驶汽车或无人驾驶卡车，经营城镇交通或当地货运业务。而且，全球咨询公司可能会转变为咨询平台，让数以百万计的个人通过该平台经营微咨询业务（或者甚至经营小型合伙咨询公司）。

### 对教育的重新思考

但是，这种大规模群体资本主义的未来要求从根本上对高等教育进行重新思考。全球各国（其中最突出是美国）都已经向大学和学院投入了巨额资金，以便在劳动者年轻时为其未来的全职工作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不过，未来的高等教育重点必须转向快速提高继续教育的可得性与质量上来。而且，美国和英国的近期政治动向也部分地反映了对于向被自动化所替代的劳动者提供新机会的投资严重不足，对于就业新格局的准备也有所欠缺。要想帮助被自动化所替代的劳动者，就需要新的大学一类的机构提供在结构和教学方法上完善转型的教育。例如，教学应该伴随有新的职业网络，并且可以获得新机会帮助他们克服住房、信贷、社区等通常会对其因追求新职业进行搬迁起阻碍作用的因素，从而为漂泊的劳动者提供新身份和目标感，让他们能够重建自我价值。





一人正在使用爱彼迎手机APP。

照片：RUSSELL HART/ALAMY STOCK PHOTO

因此，寻求这种职业生涯中期的干预应该与高中毕业后选择上大学一样自然。

而且，各国政府还必须领导建立这样的系统，在为下一代重新评估初、高中课程时也要保持谨慎，因为随着数字机器认知能力的提高，学生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面的教育可以减少，但学生可以从更加重视设计思维、企业家精神、创造力的教育中受益，为他们的未来微型企业家职业生涯作好准备。

## 必须对社会契约进行重新设计，以照顾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

同时，也必须对社会契约进行重新设计，以照顾到各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因为在 20 世纪下半叶，各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改善全职员工工作和生活质量的劳动法律，包括最低工资、加班、保险等。而且，很多国家对其他激励措施（包括稳定薪资、带薪休假、在职培训、医疗保健等）的资助是基于全职工作和雇主提供全部或部分激励措施假设而进行的。然而，未来社会安全网的设计和资金来源必须要适应劳动者越来越独立的

形势，同时也需要职业路径和群体感的替代品，而很多劳动者现在从其工作的公司中获得职业路径和群体感。所以，也许高等学校应该进一步发展，以提供此类终身职业规划。

因此，虽然今天的“千禧一代”劳动力所面临的挑战似乎相当严峻，但如果社会采取了正确的措施，那么未来就会为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位子。正如我们从托马斯·皮凯蒂 (2014) 的著作《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所了解到的，现代经济中持续不平等的最重要的驱动因素是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因此，那些政府政策将经济导向真正的群体资本主义及创造真正的分散资本所有权的国家可能也会享受到较低的不平等水平，这是经济发展令人高兴的副产品。总之，正如数字计算机迫使我们重塑工作格局一样，它们也会向我们展示通向更公平社会的道路，这也正是人类多年来所追寻的目标。<sup>[FD]</sup>

阿伦·森达拉拉詹 (ARUN SUNDARARAJAN) 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The Sharing Economy: The End of Employment and the Rise of Crowd-Based 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



照片：IMF PHOTO

# 青年之声

不断适应，持续调整，并且永远都不要停止学习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说，老年人相信一切，中年人怀疑一切，而年轻人知道一切。

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学生、刚刚起步的创业者、脸上还带有稚气的社会活动家。他们的故事让我很有共鸣，因为这些故事十分动人，富有创见性和启发性。

和所有人一样，年轻人关注的问题也因所在地区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有些问题是不管我走到哪儿都能听到的：我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岗位，让我对社会有所助益，同时又能养家糊口吗？我所在的社会是否有我的一席之地？我能否自己创业？如果能，会取得多大的成功？

这些问题给人带来很大希望，也很激动人心，但也传达了一种怀疑和不安，而这种怀疑和不安很有道理。不幸的是，当下青年失业率是总失业

率的两倍。

例如在法国，青年失业率接近 20%，而总体失业率在 10% 左右。在埃及和巴西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据国际劳工组织预计，2017 年在全球范围内有高达 7100 万的青年失业。

更复杂的问题是，找到工作的年轻人面临的挑战是快速的技术突变性中断及对其工作领域的毁灭性冲击。这种快速转型让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在猜测，10 年以后还能剩下些什么工作岗位，他们又怎样才能适应这些岗位。

## 做好准备，适应变化

幸运的是，年轻人拥有足以应对正在发生的结构式变革的法宝。

在与人们交谈中，我很快发现这一代人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很多学生现在接受了终身学习的理念，并把持续增强自身技能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亲眼目睹了千禧一代在试图掌控自己未来时，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他们中的很多人不愿意固守政府机构或大型企业的就业机会，而是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他们或设计新的在线平台，或开发之前根本不存在的市场。因此，我所看到的

年轻一代是如果面临失业就会通过创新来创造全新机会的一代。

但是，这些还不够。政府有责任创造环境，让年轻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潜能。这意味着打破监管壁垒，支持那些出师未捷的创业者，投资于代际经验指导。怎样才能做到这些呢？

## 量身打造的策略

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方法，但我的确注意到了一些实际的解决方案。其中之一是结构化的职业培训，这使得奥地利、德国、荷兰等国的青年失业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另一个解决方案是让年轻女性更容易利用托儿所并获取灵活的产后福利待遇。这些努力有助于为劳动力市场重新注入活力。

例如马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调了女孩受教育带来的经济收益。在毛里求斯，我们采取多种手段扩展妇女接触金融服务的机会。

在一些特定国家，性别歧视降低 10 个百分点会在未来 5 年里带来两个百分点的增长。

与此同时，我们的成员国需要消除阻碍竞争的壁垒，改变官僚作风。这些改革当然因国而异。在发达经济体，我们估计如果研发费用增加 40%，长期 GDP 会增加 5%。

所有的变革都会有利于处于职业生涯起步阶段的年轻人。

明智的政策选择可以解放年轻人，让他们为自己而工作，或是开设公司。与此同时，年轻创业者正面临不断增加的财务不确定性，因为他们不能再依赖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或养老金计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做些什么？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使命是促进全世界的经济稳定及增长。这意味着帮助成员国为下一代工作者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

对那些青年失业率多年来居高不下国家，这尤其重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鼓励对教育和职业培训项目进行更多公共投资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贷款项目正在积极推进这些改革。

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公私合作 (PPP) 使培训计

划更加高效。新加坡的技能未来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项目面向所有成年人，为其整个职业生涯提供无条件的职业培训补助。

但培训只是一部分。在创新方面，政府和企业能做的还有很多。例如，金融科技就是一个需要更多投资的、有吸引力的领域。

看看肯尼亚的例子，那里通过 M-Pesa 进行了创新的手机转账服务。该国政府允许通过手机缴税，降低了税务执行费用，减少了时间上的延迟。

## 当今的世界无法承受浪费如此众多的宝贵人才。

一些研究估计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过从现金和支票转向数字支付方式每年可节省 1100 亿美元。这些节省下来的钱对于创业的年轻人而言意义重大。

## 21 世纪的职业

如果我要现在踏入职场，我会强调两件事情。第一，终身学习的意愿。教育没有终点，而只有不断进步的里程碑。

第二，要乐于改变。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接受某一个领域或某一种职业的培训。对我而言，我最开始是个律师，后来成了财政部部长，现在在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要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代人在职业生涯中会面对更多的转变。拥抱这些转变，将每一个岗位上获得的东西带到下一个岗位中去。

回到王尔德，他说过，“定义就是限制”。在新经济下，全世界的年轻人面临的工作和职业是什么样子，这没有精准定义。显然，这种模糊不清的局面会带来焦虑和困惑。与此同时，也不存在对未来可能性的限制。这是下一代人的好机会，我相信全球社会将帮助他们抓住这个机会。FD

克里斯蒂娜·拉加德 (CHRISTINE LAGARDE) 是 IMF 总裁。





# 养老金冲击

发达经济体的青年一代必须采取措施  
提高自己的退休收入保障

毛里齐奥·索托

过去几十年中，公共养老金在退休收入保障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是对于已经进入劳动年龄的“千禧一代”来说，未来的公共养老金提供的安全网不会有前辈所享受的那么大。因此，“千禧一代”应该采取措施来补充自己的退休收入。

长久以来，养老金和其他种类的公共转移都是老年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成员国老年人收入的六成以上。另外，养老金也能减少贫困，如果没有养老金，经合组织 65 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会比现在高得多。

## 养老金的压力

但是，提供养老金的成本也非常高。例如，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支出中用于养老金的平均比例从 1970 年占 GDP 的 4% 上升到 2015 年的近 9%，这主要反映了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图 1，左图）。

人口老龄化由于提高了老年受益者与较年轻劳动者的比率，给养老金系统带来了压力，其中较年轻劳动者一般都是在为这些福利提供资金。而且，退休系统的压力还由于不断延长的平均寿命而雪上加霜，因为 65 岁人口的预期寿命估计每

十年会延长一岁左右。

为了解决老龄化的成本问题，很多国家都提出了重要的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在于控制领取养老金的人数的增长（一般通过提高退休年龄或收紧养老金领取资格进行）和缩小养老金的规模（一般通过调整福利分配公式进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老年人人均公共养老金支出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即所谓的“经济替代率”已经达到 35% 左右，但是预计该替代率到 2060 年时会降至 20% 以下（图 1，右图）。

这意味着，青年一代必须为退休而工作更久、储蓄更多，才能达到今天退休者的类似替代率（见图 2）：

- 工作更久：要想缩小与当今退休者的经济替代率之间的差距，青年一代的选择之一是延长自己的生产性工作期。对于那些出生于 1990 年到 2009 年，从 2055 年开始退休的人来说，将退休年龄延后 5 年（从今天的平均 63 岁延长到 2060 年的平均 68 岁），可以将与当今退休者的经济替代率之间的差距缩小一半。一方面，更长的工作期可以因延长的寿命而合理化。另一方面，延长工作期也有很多好处：首先，可以保持长期经济增长，帮助政府提高维持税收和支出政策的能力；

其次，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认知健康 (Staudinger 等人, 2016)。但是，促进更长工作期的努力应该伴随着保护贫困人口的充分措施，因为贫困人口的预期寿命一般来说低于平均寿命 (Chetty 等人, 2016)。

• **储蓄更多**：仿真研究表明，在 1990 年到 2009 年之间出生的人如果将每年收入中的 6% 储蓄起来，就可以将与当今退休者的经济替代率之间的差距缩小一半。但实际上，要达到人们为退休而进行私人储蓄的目标，还需要难以实现的幸运和精明。因为，首先，个人需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才能储蓄充足的资金；其次，劳动者必须有能力和意愿决定每年要储蓄多少以及如何投资自己的储蓄；再次，不确定性和低回报的风险要由个人承担；最后，劳动者必须要决定在退休期间以什么速度来花费自己的储蓄。所有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决策，普通人几乎在这一过程中的每个步骤上都有可能犯错 (Munnell 和 Sundén, 2004)。

### 是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对于青年一代来说，更早行动起来对于确保退休收入保障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因为预期平均寿命将不断延长。虽然“千禧一代”刚开始参加工作，退休可能是他们最不可能考虑的事，但由于很多政府都削减了自己在提供退休收入中的作用，因此年轻劳动者需要工作更久，储蓄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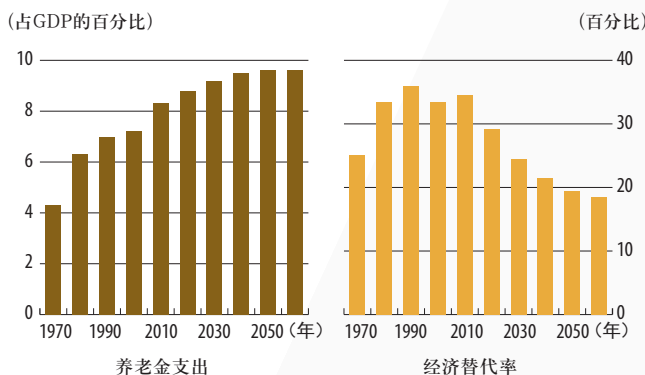
政府能够通过评估修改那些鼓励较早退休的税收和福利政策，让个人更晚退休变得更容易实现。而且，推动鼓励劳动者储蓄的政策也能提供帮助，比如通过将劳动者自动纳入私人退休储蓄计划。例如，英国将从 2018 年起要求雇主自动将劳动者纳入养老金项目。另外，提高理财素养，让职场变得对年龄较大的劳动者更友好，也可以成为解决方案中的一部分。

总之，对于青年一代来说，有利因素是离退休还有 40 年的时间，还有时间为工作更久、储蓄更多做好计划，不过他们必须立即行动起来。FD

毛里齐奥·索托 (MAURICIO SOTO) 是IMF财政事务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图1  
成本高且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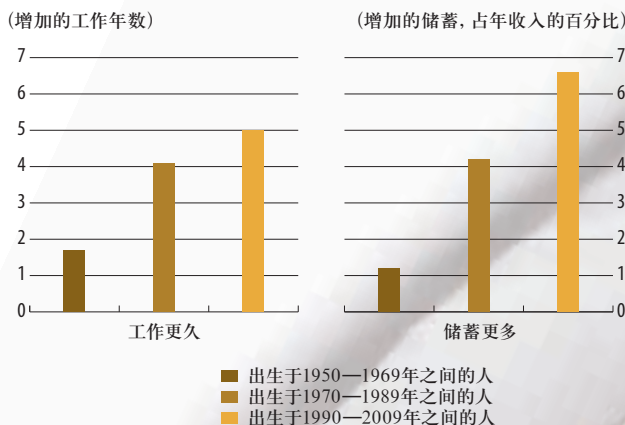
在发达经济体中，养老金支出占GDP的百分比不断提高，而老年人口人均养老金支出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经济替代率）将很快下跌。



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以及IMF员工的计算。  
注：经济替代率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养老金支出除以15—64岁人口的人均GDP。2016年以后数据为预测值。

图2  
为未来做准备

如今发达经济体中的劳动者可以通过工作更久、储蓄更多来抵消未来养老金价值下降的影响。



资料来源：IMF员工的计算。  
注：本图中的计算体现了各年龄群组将经济替代率差距缩小一半所需要增加的工作年数，以及将经济替代率差距缩小一半所需要增加的储蓄。其中，经济替代率是指65岁及以上人口的人均养老金支出除以15—64岁人口的人均GDP。

参考文献：

Chetty, Raj, and others. 2016.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Income and Life Expectancy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1–2014." *JAMA* 315 (16): 1750–766.

Munnell, Alicia H., and Annika Sundén. 2004. *Coming Up Short: The Challenge of 401(k) Plan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Staudinger, Ursula M., and others. 2016. "A Global View on the Effects of Work on Health in Later Life." *Gerontologist* 56 (Suppl 2): S281–92.



# 终身教育

劳动力市场在不断变化，“千禧一代”必须对此有所准备并进行调整

纳吉瓦·里亚德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出生于1980年到21世纪初之间，这些“千禧一代”中的大多数已开始工作，但他们未来的工作与其父辈大不相同。

技术进步不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尽管前辈们可能也经历过重大技术变革，但“千禧一代”可能将面临更快的技术颠覆，这意味着其中很多人（即使不是大多数）都将需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多次进行再培训，学习新技能。

教育的影响非常重要。据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工作的未来》(Future of Jobs)报告估计，今天的小学生中有高达65%的人可能将要从事目前还不存在的工作。因此，教育不仅要适应未来劳动者的需要和特点，还要预测不断演变的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技能并为未来的劳动者提供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将人类与机器之间的竞争变成合作，从而利用技术的力量造福个人和社会。

### 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技术已经改变了很多国家的产业和职业。今天最热门的工作中有些在十年前甚至并不存在。例如，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而兴起的应用程序开发者，以及美国半数以上企业都在使用的云计算。据埃文斯数据公司估计，2016年有1200万名移动应用程序开发者，到2020年有望增加到1400万名。

以前在相互独立领域中的开发正在不断地整合并且相互促进。例如，复制人类技能的人工智能和自我学习计算机程序正在结合传感器等其他领域的技术，来制造无人驾驶的轿车和卡车。此类创新通常需要劳动者技能的同步转型，才能实施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

麻省理工学院的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等人发现，对较高认知性技能(包括

计算能力、读写能力和在技术丰富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需求随着经济体的技术先进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例如，在1980年到2000年期间，美国非常规工作需求的激增就与知识经济基础设施的投资的扩大同步出现，而常规工作和体力劳动的需求却不断下降(见图1)。而且，未来这种变化只会加速发展。

上述趋势既不是美国独有的，也不是“千禧一代”独有的，因为技术也造成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作转移，影响到很多年龄群组。据IMF于2017年4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估计，在1991年到2014年期间，最大的50个经济体中有29个的劳动力所获得收入的份额(相对于资本所有者所获得收入的份额而言)出现下降，其中中等技能劳动力(最可能是“婴儿潮”一代)的收入份额下降幅度最大，在发达经济体以及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通信业等容易实现自动化的行业中尤其如此。另外，技术还占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幅度的一半左右。

### 知识经济时代

对美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职业就业趋势的深入研究证实，知识经济所需的高层次技能可以使劳动者获得更高的报酬。据美国人口统计局的统计，2015年美国有将近900万名劳动者在有关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领域就业，占其所有劳动人口的6%以上，这些劳动者的平均工资也比其他劳动者高29%，比2010年的26%有所上升。

而且，在过去十年中，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就业增长率也超过了其他职业领域，分别为24%和4%。这一趋势有望持续下去。据预测，在2014到2024年期间，自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就业将增长9%，而其他职业领域的就业将只增长6%。

虽然认知技能是必需的，但这并不是全部，因为团队合作、创造力、适应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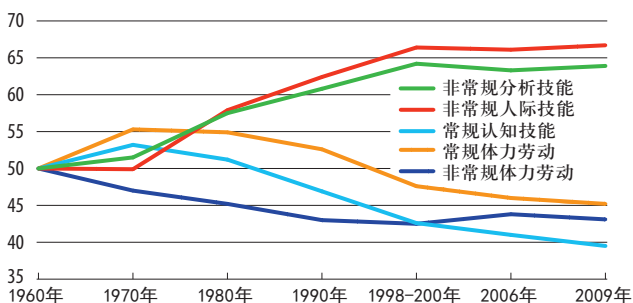
图: SHUTTERSTOCK/YANASTA



### 异乎寻常

在美国劳动力市场上，对非常规的分析技能和人际技能的需求持续上升，同时对体力劳动和常规工作的需求则出现下跌或停滞。

(平均职位需求，与1960年的差异)



资料来源：Autor, David, and Brendan Price. 2013. "The Changing Task Composi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n Update of Autor, Levy and Murmane." MIT Working Paper,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社会和文化意识等“软技能”也同样重要。哈佛大学教育和经济学教授大卫·戴明(Deming)发现，就业和工资增长最强劲的职业既需要认知性硬技能，也需要社会性软技能。

管理咨询、医疗保健和法律服务等职业既需要基本的认知技能，更需要高超的人际互动能力，而人际互动能力是机器所不能复制的。因此，未来的工作将融合科学和艺术，让人类与机器开展合作，而不是相互对立。

### 工作场所

但是，毫无疑问，社会并没有为这些新趋势提供充分的劳动力准备，其中“千禧一代”就发现自己对于工作场所的新挑战准备不足。例如，一项由德勤开展的对30个国家8000名“千禧一代”劳动者的调查发现，其中很多人并不认为高等学校为自己装备了如今企业所需要的全部技能、个人素质和经验。无独有偶，麦肯锡的一项研究也发现：接受调查的美国大学毕业生中有30%的人认为自己对于工作岗位准备不足，而雇主也同意这一观点。

知识型和技术型经济要依靠教育系统帮助学生为使用和补充技术做好准备，而且还要为进

行创新做好准备。运用标准化能力和水平测试结果的研究表明，一些国家可能比另一些国家的准备更充分。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201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对42个国家或地区的学生的自然科学、阅读和数学水平进行了深入考察，新加坡在所有三个方面都排在第一位，其后依次为日本、爱沙尼亚和中国台湾省。美国在自然科学和阅读方面的得分处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在数学方面低于平均水平，但在全球得分最高的15岁学生中美国占了其中的五分之一。

在充满海量的信息流和快速变化的世界中，未来的工作场所需要形成合力的技能集，以迎接挑战。对科学技术的了解不再只是科学家的事情，对于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作出明智决策和培育终身教育文化来说都非常关键。

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资料表明，信息和通信技术已经将职业领域的工作设计转变为更加有利于团队生产的安排，因此也有利于拥有社会技能的劳动者。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的一份报告估计，今天认为非常重要的技能中有三分之一以上将在五年后变得不再重要。而创造力和情商将位居所需能力的前三名。因此，虽然认知性硬技能和社会性软技能都在发挥作用，但对于21世纪的劳动者来说，后者可能会更加重要。

### 学习开始的地方

毫无疑问，认知技能和软技能都是在各种不同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提高。不过，正式教育仍然是学习的主要来源。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教育系统要让学生掌握目前并不存在的职业所需的技能，需要采用建立在学术机构、企业和政府之间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的教育和终身学习的整体方法。

教育系统首先必须适应“千禧一代”的特殊需要和特点，利用精通科技的“千禧一代”的学习方法，才能让教学法支持学习。

近期对“千禧一代”的研究表明，他们并不是被动的听众，而是希望采用参与式学习方法。他们以群体形式进行社交、学习和合作，并且希望技术能够成为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新数字海





虽然认知性硬技能和社会性软技能都在发挥作用，但对于21世纪的劳动者来说，后者可能会更加重要。

《经济学人》杂志报道，在“新加坡技能开创前程”计划(Singapore Skills Future)中，企业要识别未来五年所需要的技能，这些信息将被用于绘制各行业未来需要技能的图谱，然后政府将向25岁以上公民提供金融信贷，以让其获得相关技能培训。

### 合作，而非竞争

德勤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千禧一代”都认识到自动化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方面的益处，但他们当中也有40%的人将自动化视为威胁。毫不奇怪，那些愿意接受新技术的大多数人拥有更积极的观点。

这两种态度反映了人们对技术进步观点的极化现象，有些人看到了无限的新机会，而另一些人则预计会出现大规模失业。而未来的成功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教育系统要教授认知技能和情感技能，企业要通过再培训和技能升级来为自己的劳动力提供支持，劳动者自己要积极进行终身学习，政府要为上述努力创造支持性环境。

当前的技术革命不一定会造成人类和机器之间的竞争，因为通过适当的终身学习和技能更新，人类可以与机器开展合作，以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全部潜能。**FD**

纳吉瓦·里亚德(NAGWA RIAD)是IMF信息交流部主任助理。

岸线》(The New Digital Shoreline)的作者、商科教授罗杰·麦克哈尼(Roger McHaney)也对“千禧一代”教育挑战的应对方式提供了自己的一些洞见。

首先，教师必须成为“学生身边的指导者”，而不是“讲台上的智者”。教师必须扮演“艺术大师”(向新手传播新观点和信息)和“网络管理员”的角色，指导学生打造自己的学习体验，确保学生具备所需要的技术和社会技能。

教育专家波西丝·里克斯(Persis Ricks)认为，技术将会成为教育过程中的基本要素。教师需要在同样的课程和课堂上将说教式的授课转变为结合PPT和实际操作示范的教学。这对于培养“千禧一代”的试错式学习非常关键，因为他们对实际操作式学习的兴趣要高于被动听课式学习。但很多教师需要接受这些新教学方法的培训。

未来的课程将通过在线教学和面对面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很多大学海量在线公开课的快速增长也让学生能够以自己的进度和方式掌握教材内容。

虽然很多技能要从正式学校教育以外的地方获得，尤其是在工作中或通过培训获得，但随着对工作的重新定义以及为同一雇主终身服务的职业消失，再培训和终身学习成为劳动者(而不是雇主)的根本责任。

不过，雇主也需要在这方面提高自己。30个国家的“千禧一代”劳动人口中，只有1/3的人说自己的企业开展了技能教育与培训，所以，如果企业要想留住自己的员工，就必须改变这种局面。

政策制定者必须站在教育和学习政策变革计划中的最前沿。例如，韩国政府就采取长远眼光来对待其教育战略。该战略以2030年为目标实现的时间，核心范围包括提高集体智慧以运用仿真和移动技术作为研究工具，以及通过了解大脑突触和人类营养学来提高学习成果等。

另外，政府还能够通过提供再培训激励机制来提供帮助，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自谋职业者，他们支付不起额外的教育费用，因此再培训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例如，美国5300万名自由职业者中就有约1/3是“千禧一代”，根据普华永道的预计，到2020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提高。

新加坡政府已经采取这方面的措施。据《经



# 奋起直追

## 当今的年轻人不以其父辈的方式创造财富

丽莎·德特兰、乔安妮·许

千禧一代在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期间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他们当前及未来的经济决策会受到自己在成年之初所遭遇的住房市场、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历史性动荡的影响。而且，千禧一代还必须应对快速上涨的高等教育成本和不确定性的退休收入等新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他们创造财富的前景非常关键。

这些变化已经表明，千禧一代所面临的经济环境会与其前辈大不一样。本文考察了三代人的青年时期及其成年初期的情况，包括婴儿潮一代（在1946年到1964年期间出生）、X一代（1965年到1980年期间出生）和千禧一代（1980年以后出生）（见图1）。在1946年到1990年期间出生的连续几代人在青年时期经历的经济增长总体来说都低于他们的前辈。这些宏观经济条件是由于几代人所处时代的世界形势不同所造成的：二战之后的复苏、冷战的结束、电脑和互联网的兴起、全球金融危机等。总的来说，婴儿潮一代在年轻时所面临的经济增长比X一代和千禧一代要强得多，而（迄今为止）千禧一代在成年初期遭遇了最差的经济环境。

为了发现宏观经济增长格局如何影响这些不同世代典型家庭的财务状况，我们考察了“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中从1983年到2013年的变化情况。该调查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的美国家庭财富全国性抽样调查。

为了取得家庭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体财务状况，我们专注于财富净值中位数，这是对家庭净经济状况（指家庭资产与家庭负债之间的差异）的总体衡量。尽管千禧一代刚开始积累财富，但他们当前的财富净值中位数轨迹大大低于婴儿潮一代和X一代在其可比年龄阶段的财富净值中位数轨迹（见图2）。在25岁到34岁之间，典型千禧一代的财富净值中位数是相同年龄段婴儿潮一代财富净值中位数的60%。而且，尽管婴儿潮一代和X一代的青年时期情况看起来类似，但X一代的当前处境要比婴儿潮一代在相同年龄段的处境更差，这部分是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由于这三代人在青年时期遭遇的经济环境不同，他们各自面对的主要挑战和机会也不一样。本文主要关注三个影响千禧一代创造财富的特殊问题：不断上涨的高等教育成本、住房自有率的下降和家庭为退休储蓄方式的变化。因为这三个因素是家庭财富中最大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所处背景在不同世代之间的变化也非常大。

为受教育而借债：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在美国上大学的成本的上涨速度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的增速，但大学学位的经济回报率仍然非常高，而且千禧一代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面对不断上涨的高等教育成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学生贷款。学生贷款的借款人总数在1985年为890万人，但到2014年增长到4280万人，差不多增长了3.8倍。而且，学生贷款借款人的平均负债也比以前高，美国的学生贷款总额已经从1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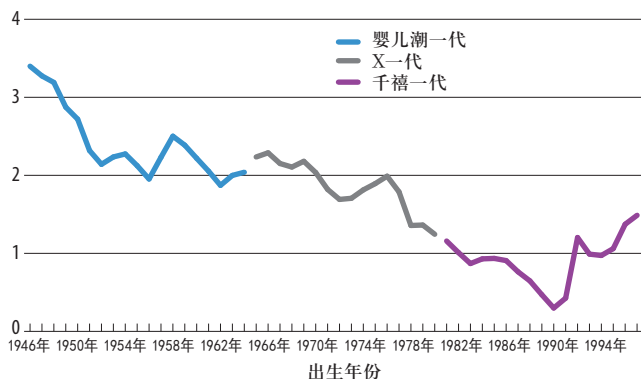


图1

## 境遇不同

千禧一代在经济增长低于前辈的时代成年，这也许能够解释他们理财习惯的不同。

(平均GDP增长率, 百分比)



资料来源: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以及世界银行国民经济核算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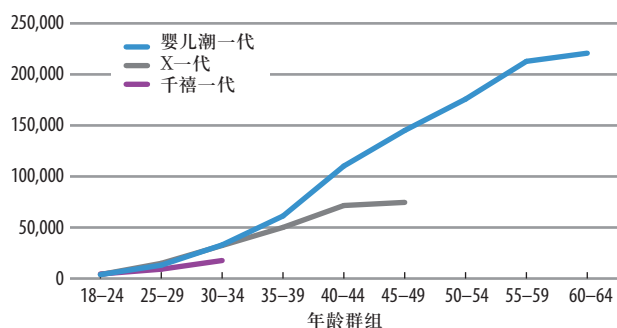
注: 本图显示了各代人处于18—31岁年龄段时的人均GDP平均增长率。本图采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数据。

图2

## 积累财富

千禧一代积累财富的轨迹大大低于其他两代人在可比年龄段时的水平。

(财富净值中位数, 2013年美元)



资料来源: “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 1983—2013年。

年 6400 万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1 万亿美元 (按 2013 年美元计算; Looney 和 Yannelis, 2015)。

因此, 千禧一代在开始工作时所背负的债务比前两代青年要高得多, 而且学生贷款债务负担可能还会继续影响他们未来的选择和经济状况。

住房自有率: 拥有住房是家庭积累财富的关键方式, 因为拥有住房建立了强制性储蓄机制, 并且让业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价差收益。而且, 住房是大多数家庭的最大资产, 房产财富与消费和生育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但是, 英国、美国和欧洲年轻人的住房自有率却出现了下降。千禧一代的住房自有率分别比

婴儿潮一代和 X 一代在相同年龄阶段时的住房自有率低将近 3% 和 10% (见图 3)。但是, 对于拥有住房的千禧一代来说, 他们的净房产财富 (住房价值减去抵押债务) 却与他们婴儿潮一代父母处于相同年龄阶段时的类似。

## 与父母同住

而且,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更多的欧洲和美国的年轻人在成年早期选择与父母共住, 而不是租房, 也不自立门户。例如,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 在美国与父母共住的千禧一代增加了将近 12%。

千禧一代是否会推迟购房或完全放弃购房, 还有待观察。新的研究表明, 借款限制等住房融资障碍了, 至少部分地造成了住房自有率的下降和与父母共住人数比率的上升 (Martins 和 Villanueva, 2009; Dettling 和 Hsu, 2014)。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未来这些住房融资障碍会不会消除, 但近期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 30 岁时经历低住房自有率的人口群组一般都会在其人生后期追赶上来 (Botazzi, Crossley 和 Wakefield, 2015)。

为退休储蓄资金: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以来, 退休政策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例如, 美国的雇主 (尤其是在私营部门的雇主) 越来越多地从慷慨的固定福利养老金计划 (由雇主提供有保证的退休收入) 转变为固定缴款账户养老金计划, 因此储蓄与管理退休财富及收入的责任转由雇员在工作时和退休后承担。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 迅速老龄化的人口也已经导致很多国家对其公共养老金政策进行改革, 一般都是减少养老金的总体慷慨支出。因此, 千禧一代对于管理和增加自己的退休储蓄有了更大的责任, 他们的退休生活所依靠的财富和收入也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见本期《金融与发展》, “养老金冲击”)。

尽管从固定福利养老金计划转变为固定缴款养老金计划, 但美国的青年一代加入养老金计划的比例还是以比其前辈们更高。不过,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养老金参与比率却出现了下降, 尤其是千禧一代家庭。随着时间的推移, 该下降趋势是否会逆转, 还有待观察 (Devlin-Foltz, Henriques 和 Sabelhaus, 2016)。

## 前途未卜

虽然千禧一代、X一代和婴儿潮一代都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经济动荡，但是由于这三代人分别处在不同阶段，因此所受到的影响也各不相同。相比起前两代人，千禧一代拥有的资产较少，因此在金融危机期间遭受的财务损失也较小（见图4）。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千禧一代和X一代可以开始再次积累财富，而婴儿潮一代的财富净值却已经停滞。尽管千禧一代的财富低于其婴儿潮一代的父母在相同年龄时的水平，但其财富净值中位数在2010年到2013年期间却提高了40%，而且他们未来仍有大量的工作时间来进一步恢复和继续积累财富。另外，如果千禧一代最终决定买房或者为退休储蓄资金，那么当市场处于上升阶段时，他们就有机会开始行动，以收获未来经济增长的收益。

千禧一代目前是美国最大的人口群组，在2015年时超过了婴儿潮一代。由于他们的巨大规模，千禧一代可以通过目前和未来进入自己黄金年代时的消费、储蓄、借贷，拥有对宏观经济发挥重大影响的潜力。不过，只有时间才能验证本文中所描述的近期趋势将会短暂还是持久地改变千禧一代的理财习惯和财富。

## FD

丽莎·德特兰（LISA DETTLING）与乔安妮·许（JOANNE HSU）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高级经济学家。本文的分析与结论仅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反映其他研究人员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观点。

## 参考文献：

Botazzi, R., T. F. Crossley, and M. Wakefield. 2015. "First-Time House Buying and Catch-up: A Cohort Study." *Economica* 82 (51): 1021–047.

Detting, Lisa J., and Joanne W. Hsu. 2014. "Returning to the Nest: Debt and Parental Co-Residence among Young Adults."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4-80, Federal Reserve Board, Washington, DC.

Devlin-Foltz, Sebastian, Alice Henriques, and John Sabelhaus. 2016. "Is the U.S. Retirement System Contributing to Rising Wealth Inequality?" *Journal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 (6): 5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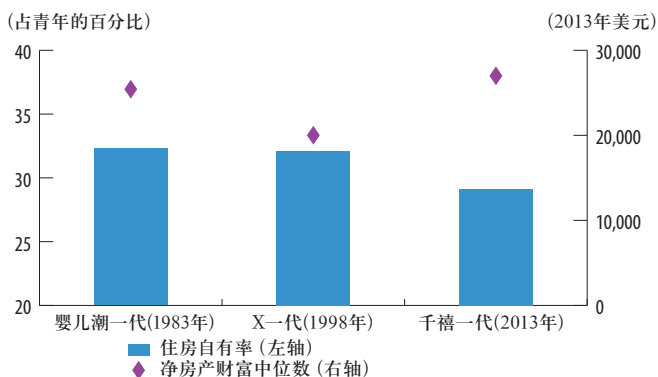
Looney, Adam, and Constantine Yannelis. 2015. "A Crisis in Student Loans? How Chang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rrowers and in the Institutions They Attended Contributed to Rising Loan Default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Fall): 1–89.

Martins, Nuno C., and Ernesto Villanueva. 2009. "Does Limited Access to Mortgage Debt

图3

## 住房自有率

美国的千禧一代的住房自有率低于前两代人在相同年龄段时的水平，但是其中拥有自己住房者的净房产财富与婴儿潮一代的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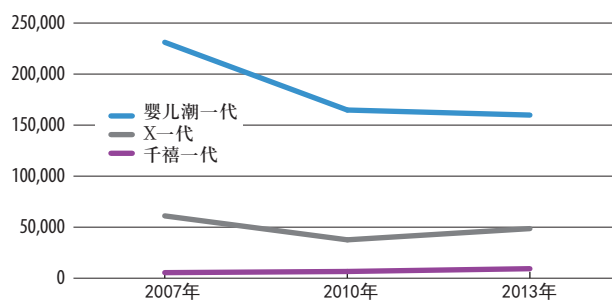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1983年、1998年和2013年。

图4

## 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美国的千禧一代拥有的资产较少，因此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遭受的财务损失也小于前两代人。

(财富净值中位数，2013年美元)



资料来源：“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2007年、2010年和2013年。

# 畅所欲言

## 千禧一代如何看待他们这代人所面临的挑战

妮可·布莱恩-基马尼、玛利亚·约万诺维奇

如今的年轻人是心怀希望还是感到沮丧？他们能找到好工作并为自己的未来而进行储蓄吗？或者仅仅是依靠工资惨淡度日？他们还相信通过接受教育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吗？或者在现有体制之外的企业家精神对他们而言更有吸引力？《金融与发展》杂志邀请全世界的青年领袖参与讨论，看看他们认为自己比父辈过得更好还是更糟。

我们在比利时、中国、埃及、尼日利亚和秘鲁进行了非正式的调查。5位年轻人就以下问题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作为个人及一个世界公民，在变化的全球环境中面对同样的挑战时，什么是最重要的？

所有的年轻人都认为他们这一代身处地球村的中心，通过科技与世界相连并能轻松获得信息，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都是世界公民。来自秘鲁的玛丽埃尔·伦特里亚说：“这一代人筑起的是桥梁，而不是围墙。”他们这代人更有企业家精神，不管是出于这是经济必需品还是他们自己的意愿。

那么，全世界的年轻人都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是否仅仅因为没有更好的选择而从事卑微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又会对政策制定者说些什么呢？以下，5位具有影响力的青年讲述了是什么激励了他们。

照片：ISTOCK / BIDIZY / JAMIELAWTON





照片: ESTER MARIENTERIA



### 秘鲁：马里埃尔·伦特里亚

一家支持年轻社会企业家的非营利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董事会成员

马里埃尔·伦特里亚 (Mariel Renteria) 坚信教育的力量，鼓励自己国家的年轻人发展并拥有积极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全球视野。马里埃尔说，教育是秘鲁年轻人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她指出，一项由秘鲁最著名的大学生最高级别会议 CADE Universitario 的 IPAE Acción Empresarial 进行的调查显示了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利的重要性，但国家投入进行改善教育体系也非常重要。她称赞秘鲁教育部部长招募高水平、有责任心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人作为公务员的举措。“我们这一代人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如今教育被认为是未来个人发展及整改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

更好的和更多的可持续教育能帮助那些农村地区的贫困青年在城市地区获得机遇。“社会不平等是一个急需解决得全国性问题，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挑战，将我们凝聚在一起。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对全国教育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并大力改善数字和基础设施连通性，促进其他平台的发展，让我们能与世界互联互通。”

照片: ETOUCES



### 法国：提耶博·韦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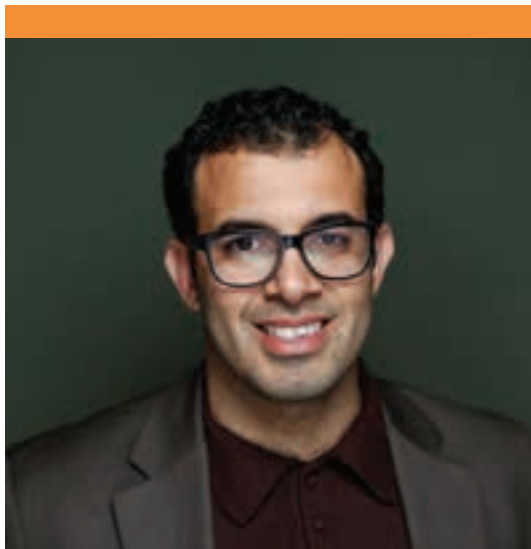
欧洲工会联盟主席

提耶博·韦伯 (Thiébaud Weber) 援引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自然界厌恶真空。”这位青年领袖认为，创新是欧洲年轻人的前进之路。“在欧洲，很多创新项目正在进行当中，诸如短路系统、共用工作空间、数字平台工人防御、团结移民及合作社。这些项目都有年轻人的参与。而他们参与其中的意愿是好的，并且工人运动也需要这样的参与。工会是他们实现自己新奇点子的巨大‘实验室’。”

提耶博认为，好的工作会让员工感觉自己获得了充分授权——这是工人运动发起的理念。“一份好的工作还会给员工以安全保障和尊重，不论其年龄和地位。不管是供职于公司还是自己创业，说到底你都是一名员工。”

他补充说，安全还意味着保护员工免遭不公平解雇或网络上的攻击，并且意味着一份合理薪酬的工作，以使员工能努力工作并能享受社会保障。

同时，他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把年轻的员工看作是未来的长期投资。他们不仅应该关注增长和工作岗位的创造，还应该关注工作的公平性。“危险和低报酬工作并不是‘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年轻员工工作非常努力，但雇主和政策制定者不能将此看作是一种顺从。他们应该谨记：危险将导致极端主义的出现。”



照片：MARIM OMBAN

“如今年轻人能够通过网络直接学习世界知名教授的课程。”

## 埃及：贾瓦德·纳布勒西

Nebny发展基金会创始人，该基金会为小学生提供课外活动项目

通过 Nebny 发展基金会，其创始人贾瓦德·纳布勒西 (Jawad Nabulsi) 有机会与住在开罗贫困的曼施纳赛尔地区的年轻人进行接触。他发现，尽管这些年轻人处境困难，但他们仍表现除了强烈的“创造、组织、开发以及从试验和错误中学习成长”的愿望。当正式的教育和就业体系不能为其提供所需要的技能和机会时，这一代青年在努力争取自己的未来。

为了摆脱贫穷，这些年轻人对他们自己及其社区所面临问题提出了富有创意和影响深远的解决办法。他们被称为是“无形的企业家”——他们的预算很少，没有那些出席国际论坛和会议的精英阶层企业家所拥有的高学历。但埃及的这些“无形的企业家”却拥有比那些外在名声更好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激励着他们向前。“他们只想要生存下去，而这恐怕是任何社会企业形成的最强有力的动机，”贾瓦德说，“他们并不满足社会认为的典型企业家的标准。”

由于对曼施纳赛尔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些企业家们是处理该地区所面临问题的最佳人选。他们不仅了解情况，而且也有做出改变的动机和热情。

而仅仅是做出小小的改变就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些企业家们的项目和观点的成功为其社区带来了正向反馈循环。正如贾瓦德所指出的，“曼施纳赛尔和精英学校之间的差距在进一步缩小。”多年过去了，很多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为埃及的年轻人提供机会，获得其所受教育之外的补充教育。“那些曾经对自己身边的小圈子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如今能够通过网络直接学习世界知名教授的课程，”贾瓦德这样说道。这些组织所提供的终身学习机会是之前几代人所无法想象的。

发生在开罗贫困地区的这些改变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企业家致力于改善自己生活的决心和动力的功劳——与此同时，他们也改变了自己所在的社区。在他们所取得的成功当中，贾瓦德发现了识别和投资于其他年轻人的有利证据，这些年轻人拥有巨大热情和创新理念，以“发展其周围环境和社会”。

照片: TH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STITUTE FOR GLOBAL DEVELOPMENT (INDIG)



## 尼日利亚：查尔斯·阿克赫米恩

MOBicure的共同创始人，这是一家利用科技解决发展中经济体医疗卫生问题的移动医疗公司

查尔斯·阿克赫米恩(Charles Akhimien)讲述了一个名叫克里斯的尼日利亚人因其祖国和整个非洲缺乏社会安全网而梦碎的故事。克里斯拥有石油钻采工程学硕士学位，并梦想加入尼日利亚的石油公司，成为一名工程师。那时，该国的原油行业蓬勃发展，石油公司为尼日利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他想象自己的工资将高达六位数，这足以养活自己和年迈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但四年过去了，他仍未找到这样的工作。为了生存，他不得不从事低薪酬的卑贱的工作。

然而，像克里斯这样的人还有很多：非洲是全世界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查尔斯认为，克里斯的问题是政府失职所造成的。他说，政治稳定、没有腐败以及更好教育体系对于授予年轻人技能以满足现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查尔斯仍心存希望。他说，虽然年轻人失业现象很普遍，但非洲在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方面正在稳步迅速发展，这在诸如内罗毕、拉各斯和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城市尤其明显。在这些地方，创新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而其中大部分都是由年轻人所运营的，他们致力于做出改变。

“青年一代是非洲的未来。非洲的年轻人越来越认识到，想要繁荣发展，他们必须要努力，亲手创造出自己的未来。”



照片: TM MEDIA

## 中国：凯西·龚

WagaGames的共同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凯西·龚(Kathy Gong)相信通过自己的决心、勇气和创造力，个人是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她认为他们这一代人恰恰拥有以上特质。

她的决心让她与“户口”作斗争。这是一种全国性的户口登记体系，表明了居民的正式居住地，但同时也引发了在医疗卫生、财产所有权和基础教育方面的不公平问题。她讲述了自己的父母是如何决定从农村搬到城市做生意的故事。当她由于户口问题而被当地小学拒绝入学之后，进入了一所象棋学校进行学习，并最终在十岁的时候成为全国年龄最小的象棋冠军。

凯西认为，中国的其他年轻人也都拥有让自己过得更好的这一类似的自我驱动因素和动力——比起遵循传统来说，他们更想要主导自己的生活。但她也很清楚，由于工作地点的转变以及担心没有足够的钱来养活孩子、买房以及支付退休生活所需，他们这代人所面临的压力更大。

她说，“我们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一代，因为他们是创造力的核心组成群体，是突破性创新的背后力量，是更公平社会的倡导者，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引擎。”<sup>FD</sup>

妮可·布莱恩-基马尼(NICCOLE BRAYNEN-KIMANI)、玛利亚·约万诺维奇(MARIA JOVANOVIĆ)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 悲观的 预言家

克里斯·韦利斯采访罗伯特·J.戈登——戈登认为技术创新减  
速会损害经济发展

罗伯特·J·戈登 (Robert J. Gordon) 给美国“千禧一代”带来了坏消息：与 19 世纪的前辈不同，他们不能将自己的生活水平提高到其父母生活水平的两倍。

“我是个悲观的预言家，”76 岁的戈登坐在自己位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西北大学的摆满书籍的办公室中如是说。戈登是畅销书《美国增长的起落》(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 的作者。该书认为美国可能要面临经济低迷，主要原因在于未来的发明不可能像 1870 年到 1970 年那个“独特世纪”里的发明那样具有革命性，这一观点颇具争议。

他认为，电力、内燃发动机、室内给排水设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但难以复制，其后的大多数技术进步都是渐进式的，而非革命性的。

“我们从乘坐马车发展到乘坐波音 707 飞机，但其后的运输速度并没有变得更快，”在芝加哥市以北密歇根湖畔的校园中，戈登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他说，“1844 年的电报创造了即时通信，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在细化即时通信。”

## 象牙塔之外

2016 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使戈登声名远播，进入了象牙塔之外经济学家的行列。戈登估计自己已经接受了 80 次记者采访，也收到超过 200 封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此外，他还发表了公益性的 TED 演讲，登上了电视荧幕。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也是这本书的读者之一。

戈登的悲观观点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引起了共鸣。哈佛大学的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让“长期停滞”这一概念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众多学者都在努力解释这一现象。例如，在 1970 年到 2014 年期间，劳动生产率 (工作小时平均产出) 年均增长 1.62%，而在此前的半个世纪中平均每年增长 2.82%。

这本 762 页的书详细描述了美国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变革的多彩画卷，从购物、娱乐到医药和银行等多个方面，即使是那些对其结论持不同意见的人，也对他的渊博学识表示钦佩。

“鲍勃对于过去的看法不容置疑，”安德鲁·麦卡菲 (Andrew McAfee) 说。他与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 (Erik Brynjolfsson) 合著了《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ry Age)，该书认为电脑和其他数字科技对于智力的作用就像蒸汽机对于体力的作用一样。“他提出的观点非常好，过去的一百年确实是个特别的世纪。鲍勃与我之间的分歧在于对当前进行的创新及其未来发展的看法。”

## 降低影响

戈登对于电脑和互联网等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并没有异议，这些技术进步造就了 1996 年到 2004 年的经济增长，但是他认为这些技术进步中的大多数都还达不到过去“伟大发明”的标准，因为“伟大发明”重塑经济的能力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所无法比拟的。在公开露面时，戈登并排展示了两幅图片，一幅是智能手机，另一幅是抽水马桶，然后问：“你们更愿意舍弃哪一个？”

他乐意扮演站在技术乐观主义者对立面的角色。他的智力辩论对手之一是西北大学的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 (Joel Mokyr)。莫基尔开玩笑地称戈登为“令人尊敬却误入歧途的同事”。

“我们实际上对大多数问题持相同意见。”莫基尔最近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 IMF 总部露面的时说，当时他在讨论自己最近出版的新书《增长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在该书中，莫基尔认为，1500 年到 1700 年期间在西欧产生的价值观和信念塑造了科学探究的精神，从而奠定了其后伟大发明的基础。蒸汽机的先决条件之一是能够产生真空的发现。

“回顾一下过去十年中的科学和科学进步，你会发现它一直都是那样令人激动。”莫基尔说。

但戈登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自己没有发现什么最新技术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证据。

“虽然研究者提出了很多东西，比如可移植身体器官以及大量的医药革命，但是要真正对其加以实现并运用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戈登说。

《美国增长的起落》是戈登几十年从事经济增长来源研究的顶峰。在他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



文中，戈登开发了一种估计建筑成本的新方法，最终在1990年形成他开创性的著作《耐用品价格的测量》(The Measurement of Durable Goods Prices)，该书阐述了对那些无法说明质量改善情况资本的标准测量方法。“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贡献，它改变了人们思考增长的方式，”西北大学经济系主任劳伦斯·克里斯蒂亚诺(Lawrence Christiano)表示。

通货膨胀是戈登的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传统的观点认为高通胀通常伴随着低失业，即菲利普斯曲线，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现象(即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上升)却挑战了这一传统观念。

戈登率先开发出菲利普斯曲线的修改版本，在其中考虑了类似1973年石油危机等供给冲击的影响。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原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飙升至12美元。

该项研究奠定了戈登称之为通货膨胀“三角”模型的基础，该模型解释了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及惰性的作用，其中惰性是指供应和需求的变化对

明了“核心”通货膨胀的重要性，其中“核心”通货膨胀剔除了多变的食品价格和能源价格的影响，从而让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制定者专注于长期通货膨胀趋势，忽略类似汽油价格突然上涨等变化所导致的短期波动。

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称之为“非常重要”的贡献。

“我们在近期看到了整体通货膨胀率的两次(2008年和2011年)急剧上升，很多人警告说中央银行没有跟上形势，并且要求提高利率和/或恢复量化宽松，”克鲁格曼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如是说。

“但是，这两次完全是由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造成的，核心通胀并没有变化，而联储总是专注于核心通胀，因此决定维持原来的政策是正确的。”

《美国增长的起落》一书的灵感来自戈登一次前往密歇根家庭旅馆的旅行过程中，因为他当时偶然看到了奥托·贝特曼(Otto Bettmann)的一本名为《美好旧时光：真可怕!》(Good Old Days:

## 戈登乐意扮演站在技术乐观主义者对立面的角色。

总体价格水平产生影响所需要的时间。

该模型也能够用来解释20世纪90年代的“金发女孩经济”现象，即失业与通货膨胀都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戈登现在计划更新该模型，以解释为什么价格在2008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会不因产出和就业的剧烈冲击而持续上涨。

在“金发女孩经济”时代，戈登参加了研究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准确性的五人经济学家小组，该小组由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于1995年成立，以其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博斯金(Michael Bookin)的名字命名：博斯金委员会。该委员会的研究结论认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通货膨胀高估了1.1个百分点。

美国劳工统计局采纳了该委员会有关改变计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方法的部分建议。

戈登在通货膨胀“三角”模型方面的工作表

They Were Terrible!)的摄影集，该摄影集由贝特曼照片档案的创始人编辑，反映了19世纪后期贫民窟的悲惨生活。“所以，想看看，从那以后很多方面的巨大进步是如何发生的，也就很自然了，”戈登回忆说。

戈登花了四年时间来写《美国增长的起落》，并且有一个研究助理团队为其提供协助。他的办公室和家中塞满了成堆的书，书中到处贴着即时贴便条，因此我们能在书中看到有关美国内战以前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以及其后由室内给排水设施、电灯和厨房设备等发明带来的巨大改善的详细描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安德鲁·萨贝内(Andrew Sabene)是戈登的研究助理之一，他当时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西北大学的交通图书馆中，仔细查阅19世纪的铁路时刻表。

萨贝内认为戈登是苛刻的老板，要求研究助



理充分利用时间。但是，他们两人最终还是由于对音乐的共同兴趣而相处融洽，甚至还同戈登的妻子朱莉一起喝咖啡，谈论他们喜爱的古典作曲家和百老汇音乐剧，朱莉是位肖像画家和西北大学英语与电影教授。

戈登的办公室整洁而拥挤，这也是他兴趣广泛的一个证明，他的兴趣包括摄影、飞行和历史。尽管他的书架上摆满了经济学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他自己广受欢迎的《宏观经济学》教材的多个版本，但他办公室的墙上也挂满了自己前往印度和泰国等国家旅行时的照片。

在有 200 多位学生参加的中级宏观经济学课堂上，戈登讲了一堂活泼而有条理的课，在投影仪的帮助下，边讲授课程边播放图片。

戈登表示自己喜欢教学工作，尤其喜欢自己的题为“经济学赢了两次世界大战吗？”的新生讨论课。他说：“这个题目是遮人耳目的小伎俩，因为这堂课是关于战争本身的，而不仅仅是经济学。”

这个小伎俩反映了他年轻时对历史的兴趣。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他首先读的就是历史专业，但是在有一门课得了 B 之后他改变了想法。他说，“历史太主观了，有着太多可能的答案。但也许我只是对有门课得 B 太紧张了。”

## 这一家子

所以，他最终还是子承父业。他的父母亲罗伯特·阿龙 (Robert Aaron) 和玛格丽特·戈登 (Margaret Gordon) 都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杰出经济学家。另外，他的弟弟大卫·戈登 (David Gordon) 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曾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于 1996 年因病毒性心脏病去世，年仅 51 岁。

在 1962 年从哈佛毕业之后，戈登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导师为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索洛 (Robert Solow)，索洛在 1987 年有句名言：电脑时代随处可见，但除了生产率统计数据。(大约十年之后，新技术对生产率才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戈登认为，创新的减速不是阻碍增长的唯一因素，美国经济还面临着其他不利因素，比如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难以提高的教育程度、社会老龄化、政府的债务负担等。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通过削减个人和公司



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预测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将会急剧下降。

照片：JUSTIN RUNQUIST

所得税以及 1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将增长率提高到每年 3% 到 4% 的计划。那么戈登的悲观预言预示着该计划的结果会怎样呢？

戈登认为，特朗普的刺激计划可以在短期提高生产率和增长，因为现有劳动者的劳动强度会提高，新劳动力的就业也会增加，但是这些作用都不可能持续超过一两年。

他列举了一系列障碍因素：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导致美元升值和利率提高，从而反过来限制增长；削减除国防以外的支出也可能会适得其反；通过主要针对富人受益的减税措施来刺激需求也可能收效甚微，因为相对于穷人来说，富人增加支出的可能性更小。

戈登认为，政策制定者反而应该聚焦于提高长期生产率，主要通过改善教育和培训来实现。他建议消除富裕公共学校和贫穷公共学校之间的差异，加大对幼儿教育的投资，建立德国式职业培训体系。

戈登的前研究助理萨贝内现在在麦肯锡咨询公司任顾问。他表示，即使美国已经完全实现了过去伟大发明带来的好处，但是这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实现，他为此深感振奋。

“想想印度等国家吧，那些地方的自来水和城镇化等一切的一切都仍有待发展，”他说，“知道还有很多事可以做，我感到非常欣慰。” **FD**

克里斯·韦利斯 (CHRIS WELLISZ)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An illustration on a teal background showing two hands exchanging a banknote and a credit card. The top hand, wearing a dark suit sleeve, holds a white banknote with a stylized sun and dollar signs. The bottom hand, also in a dark suit sleeve, holds a yellow credit card with a black chip and the numbers '4444 3333 2222 1111'.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horizontal white lines and a spiral binding on the right side.

# 现金已死， 还是现金万岁

## 虚拟支付正在快速取代现金支付，但却没有完全取代

艾伦·惠特利

目前只有少数北欧银行还在自己的分支机构中使用现金，印度最近报废了自己 86% 的钞票，韩国则计划在 2020 年停止使用铸币，而在线支付却正在蓬勃发展，因此，通向无现金社会的进程似乎势不可挡。

特别是年轻人、富人和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他们越来越多地习惯于使用银行卡或手机进行支付。例如，荷兰的银行卡交易量就在 2015 年首次超过了现金交易量 (NFPS, 2016)。

但在奥地利、德国、日本、新加坡和瑞士等发达经济体，现金仍然是最主要的支付方式，而且没有“让位”的迹象。另外，全球所有支付中仍然有 85% 左右是用现金进行的。

欧洲中央银行执行理事会成员伊夫·默施 (Yves Mersch) 表示：“无现金社会虽然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很可能也会像以前大肆鼓吹的无纸化办公一样难以实现。”

从理论上说，如果有更高效的支付方式出现，现金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内在理由。玛瑙、贝壳曾经也是有用的交易媒介，而钞票只在印刷机普及和足够可靠之后才开始使用。

“我们可以将现代通信技术看作是 17 世纪的印刷机。如今互联网接入已经非常普遍，电脑、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也在家庭中普及，因此，推



出电子化支付方式的条件已经成熟，”瑞典央行副银行塞西莉亚·斯金斯利 (Cecilia Skingsley) 这样说道。

瑞典正在率先开辟无现金的交易之路。目前，其销售交易中只有 15% 是使用现金进行的。由于瑞典地广人稀，现金配送成本非常高，所以只有不到一半的瑞典银行还在处理现金业务。仅在 2007 年到 2015 年期间，瑞典的现金流通量就下降了近 15%。甚至，在斯德哥尔摩，路边贩卖杂志的销售商都接受移动支付。

## 网络效应

零售支付的成功数字化取决于经济规模和网络效应。例如，在技术普及的瑞典，消费者和商家都乐于不用现金。另外，这一趋势还因为瑞典最大银行之间的长期合作传统而强化，因为这些大银行之间共同经营着该国的支付基础设施。所以，提供实时支付的新服务一经推出，就立即普及到大多数人中。

“但是，如果观察一些更大的国家，比如德国和美国，你就会发现，在这些国家，有太多的重要参与方，所以更难创造这种合作的氛围，”瑞典央行金融稳定部的比亚尔恩·塞根多夫 (Björn Segendorf) 告诉《金融与发展》杂志。

使用特定平台的人越多，该平台的吸引力就越大，就像 Facebook。M-PESA 移动支付服务在肯尼亚异军突起，也是因为该国只有一家垄断移动运营商萨法利通信公司 (Safaricom)，而且在该国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银行服务，而金融市场是其迫切需要开放的市场。

“M-Pesa 是网络外部性促进非现金支付很好的例证，”加拿大央行的基姆·许恩 (Kim Huynh) 告诉本刊，“加拿大的非接触式信用卡也是类似的例子。”加拿大非接触式信用卡的使用量在 2009 年到 2013 年期间增长了三倍 (Fung, Huynh 和 Stuber, 2015)。非接触式信用卡和非接触式设备内部装有天线，在接近或正对着专用终端时，可以双向传输交易信息。

中国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银行卡支付，现在直接从现金支付跨越到了移动支付。中国的移动支付使用者数量在 2015 年大幅增加了 64.5%，而且在 2015 年年底其 7.1 亿网民中有将近六成的人使用移动设备进行支付。

另外，印度为打击非法收入而从流通中回收面额为 100 卢比和 500 卢比的钞票。虽然该计划因执行笨拙而倍受批评，但印度正在为数字支付网络奠定基础，通过将生物特征识别数据进行分类编码，让民众开立得到补贴的银行账户。

## 减少犯罪，增加税收

并不是只有印度在试图通过控制使用现金来增加税收、减少犯罪和腐败。欧洲也有很多国家都对现金交易设定了限额，而且欧洲央行计划在 2018 年停止印制面额为 500 欧元的钞票，这也是其最大面额的钞票。

渣打银行前首席执行官彼得·桑兹 (Peter Sands) 对欧洲央行持批评态度，认为其没有采取更快的行动停止发行 500 欧元钞票，以及鼓励回收流通中的 500 欧元钞票。但是，他也补充说：“好消息是，人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认为现金 (尤其是大额钞票) 在促进非法活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们现在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认为现金在促进非法活动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桑兹建议，二十国集团国家之间应该签订条约，迅速回收所有面值超过 50 美元的硬通货钞票，因为这些钞票主导着不发达国家的非法金融流动，其中最大面额的 100 美元钞票中有六成以上都在美国以外的地区流通。“废除这些钞票是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减少腐败、增加税收所能做的最好事情之一，”桑兹告诉本刊。

美国前财政部部长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 和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肯尼斯·罗戈夫 (Kenneth Rogoff) 也建议逐步废除大额钞票，但这样做会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中，瑞士并没有计划废除其 1000 瑞士法郎面额的钞票，该钞票是世界上最大面额的钞票之一 (见“现金之巅”，《金融与发展》2016 年 12 月号)。

除了打击地下经济以外，取代现金还能节省成本，因为除了最小额银行卡支付以外，其他支



付的处理成本都低于处理现金的成本。例如，韩国计划废除铸币，就是因为铸币的成本已经超过其面值。在新加坡，现金占其消费支付的60%，支票占30%。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一项研究，取代现金可以节省的成本相当于其GDP的0.5%。

的确，央行可能会放弃铸币税，即发行货币所带来的利润，因为铸币税通常都很少。但无论如何，正如桑兹在提供给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一篇论文中所说的，“因为能够赚钱就向犯罪份子提供大额钞票是不可原谅的。”

罗戈夫认为，废除大额钞票还能对货币政策提供帮助，因为如果不再存在将银行存款转变为现金的挤兑威胁，央行就可以在通货紧缩时期有更大的自由空间来实施负利率政策。

现金使用的减少正在改变确保支付系统安全和效率的任务，因为监管机构对伪钞和银行盗窃的担心减少，而对网络盗窃的担心增多。

## 很多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探索发行自己的电子货币的价值。

监管机构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是将数字金融的供应最大化。目前全世界有20亿人没有银行账户，这阻碍了增长，让贫困难以消除，所以金融包容性在金融政策议程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在发达经济体中，没有接入互联网的人发现自己难以获得的不仅是电子支付服务，而是一切服务。“这不只是数字排斥问题，”瑞典央行的塞根多夫说，“这些人被排斥在社会的大部分之外。”

### 使用现金的理由

虽然数字化趋势可能不可逆转，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可以迅速取消所有现金，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例如，桑兹就不这么认为。他说：“低价值现金工具是非常灵活和耐用的支付工具。你不需要电、无线网络或者手机信号就能使用现金，你甚至不需要识字。”

一些发达经济体也非常依赖现金。一项涵盖七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联合调查显示，这七个国家中有六个国家的现金支付占其全部交易额的一半

以上。在奥地利和德国，该比例为82% (Bagnall等人)。但在接受调查的各个国家中，现金使用的比例随着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之一是，看一眼钱包就可以让预算吃紧的家庭更容易地监控自己的财务状况。

人们已经提出很多原因来解释德国等国家为什么如此依赖现金，其中之一是厌恶负债（因此也厌恶信用卡），另一个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民众记忆。虽然研究人员对后一观点表示怀疑(Bagnall等人)，但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各地消费者在选择支付方式时并不是完全理性的。

荷兰中央银行的弗兰克·范德霍斯特 (Frank van der Horst) 与埃斯特尔·马泰森 (Ester Matthijsen) 认为，“决策更多的是情绪过程，而不是认知过程。”他们指出，“总的来说，现金支付能够比借记卡支付触发更积极的情绪。” (Deutsche Bundesbank, 2014)。不妨这样想想：如果要给小孩送礼物，是给一张大面额的崭新钞票还是开一张支票更能让人产生满足感呢？

西班牙央行的达里奥·内格鲁埃拉 (Dario Negueruela) 认为，无论对现金的依赖是出于潜意识还是返祖现象，它都是不可忽视的：“现金具有某种特别的魔力，能够将现金与人的感觉以及深层次的原始人类情感联系起来 (Deutsche Bundesbank, 2014)。”

对一些人来说，现金是财富和地位的有形象征，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现金是防范全面入侵的“老大哥”式监视之国通过迫使他们留下电子支付痕迹来剥夺其匿名性企图的有效手段。

迈克尔·汤姆林森 (Michael Tomlinson) 是一位68岁的伦敦律师，他虽然乐于使用自己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移动支付，但每个月也会提取1000英镑以上的现金，用于在餐厅支付小费以及紧急情况下的支付，比如他的信用卡被黑，而且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过。

汤姆林森从来没有想过没有现金会如何。“作为消费者，选择越多我越喜欢，”他说，“我不认为自己有理由要与银行保持一致。”

或者，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所说，“金钱是被铸造出来的自由。”

### 未来拥有什么呢？

创新将提供越来越多的无现金应用机会。伊

恩·皮尔逊 (Ian Peterson) 是一位未来学家, 经营着一家名为 Futurizon 的英国咨询公司, 他预计电子图章戒指等安全首饰将进入市场, 为支付验证服务。另外, 皮尔逊在一份提交给英国支付委员会的报告中还预计, 通过指纹识别, 甚至握手进行转账也将成为可能。不过他却认为技术会延长现金的寿命, 而不是消灭现金, 因为人们未来会更重视隐私。“甚至到 2040 年, 我们仍然需要零用的日常现金,” 皮尔逊告诉本刊。

## 新的支付方式

中央银行想要掌握的新支付形式之核心焦点是迅速发展的区块链技术, 也就是支撑数字货币比特币的核心技术 (见“互联网信用”, 《金融与发展》2016 年 6 月号)。

据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在 2016 年 12 月成功地完成了一次银行承兑汇票交易和结算系统的试运行, 其中使用的货币就是该行开发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

另外, 包括瑞典央行在内的其他中央银行也都在探索发行自己的电子货币的价值, 以及相关的政策影响。例如, 公众对于电子克朗 (e-krona) 不可预测的需求可能会在理论上造成瑞典央行难以在货币市场上实施微调操作, 也难以控制货币供应量, 瑞典央行副行长斯金斯利警告说 (Skingsley, 2016)。

区块链的潜力不仅在于培育有竞争力的电子货币, 还在于允许通过点对点网络取代现有的集中式支付系统。因为该技术有一个持续更新的账户记录所有交易, 并将其备份分发给所有参与者。而且, 由于避免了通过中央银行支付系统的需要, 结算可以更快, 成本也更低。

挪威中央银行副行长约翰·尼古拉森 (John Nicolaisen) 认为, 社会可能会从去中心化的金融结构中大大受益。但是, 这一前景也引发了一个根本问题, 即银行的存贷款会因此受到什么影响。

加拿大中央银行高级副行长卡罗琳·威尔金斯 (Carolyn Wilkins) 补充说, 分布式账户技术可能将监管机构带入有关法律和治理问题的未知领域。而且, 如果一些支付提供商变得“规模太大而不能倒”, 那么新金融科技应用程序还可能对金融稳定产生影响, 威尔金斯这样表示。

虽然央行行长们没有帮助回答所有这些问题



的先例, 但他们具备时间上的优势, 因为他们预计钞票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使用。罗戈夫在自己的著作《现金的诅咒》(The Curse of Cash) 中建议转向“较少现金”的社会, 而不是无现金社会。其理由之一是, 无论谁来经营新支付技术, 他们都要赢得大众的信任, 而对于银行来说, 信任已经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遭受重创。

瑞典央行官员塞根多夫表示, 他个人认为有朝一日瑞典会完全废除现金。不过, 调查发达经济体支付方法的中央银行研究人员可能更好地反映了当今的共识, 他们的结论认为: “有关现金死亡的报告是在夸大其辞。” (Deutsche Bundesbank, 2014)。FD

艾伦·惠特利 (ALAN WHEATLEY) 是经济学撰稿人兼编辑, 曾任职于路透社, 也是《货币的力量》(The Power of Currencies) 一书的编辑和合著者。

### 参考文献:

- Bagnall, John, and others. 2016. “Consumer Cash Usage: 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with Payment Diary Survey Da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 (December).
- Deutsche Bundesbank. 2014. “The Usage, Costs, and Benefits of Cash—Revisited.” *International Cash Conference Report*.
- Fung, Ben, Kim P. Huynh, and Gerald Stuber. 2015. “The Use of Cash in Canada.” *Bank of Canada Review* (Spring).
- National Forum on the Payment System (NFPS). 2016. *2015 Annual Report*. Amsterdam: De Nederlandsche Bank.
- Skingsley, Cecilia. 2016. “Should the Riksbank Issue ekrone?” *Speech at Fintech Stockholm*, November 16.

# 投资减速

## 自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已经减速

M. 艾汉·科泽、弗兰齐斯卡·L. 奥恩佐格、叶蕾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已经大幅减速，年增长率从2010年的10%降至2016年的3.5%。尽管最近出现复苏的迹象，但过去3年的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增长率不仅远远低于其危机前的两位数水平，也低于其长期平均值。

而且，投资疲软的范围非常广泛。在2016年，有六成以上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都低于其长期平均值，是过去25年（不包括2009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期间）中经历如此不景气的国家数量最多的一年（见图1）。尽管私人 and 公共投资中存在大量的未满足的投资需求，但投资疲软仍然在持续。

投资减速在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和大宗商品出口国表现最明显。在2010年到2016年期间，金砖国家的投资增长率从大约13%降至4%左右，而金砖国家以外的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则从7%左右降至0.1%。中国占了此期间这些

经济体总投资增长率减速中的1/3，巴西和俄罗斯占了另外的1/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的持续减速与发达经济体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部分复苏形成对照。例如，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在2010年到2015年期间平均为2.1%，到2014年已经恢复到其长期平均水平，并且距离其危机的前水平也不远。

### 投资增长为什么会减速？

投资减速反映了抵消非常良好金融条件的一系列因素，其中良好金融条件包括创历史新低的借款成本、充足的金融市场流动性以及很多国家非金融私营部门国内私人信贷的快速增长。但是，很多不利因素抵消了截至2016年后期的历史上最低融资成本的作用，其中包括大宗商品出口国令人失望的经济活动、疲弱的增长前景和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严重下跌（即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陷入困境的主要经济体减速并且波动的资本





流动、私人债务的快速累积和多次出现的政策不确定性。

我们估算了这些内部和外部因素在影响投资增长方面的相对重要性。

**中期不利因素：**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产出增长的放缓只占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放缓中的很小一部分。

**贸易条件冲击**对于石油出口国来说更加重要；对于大宗商品进口国来说，外国直接投资（即外国人为所有者的投资）流入的减慢是主要影响因素；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来说，私人债务负担和政治风险造成了主要影响。实际上，对于石油出口国来说，由于2014年开始的石油价格下跌所造成的贸易条件冲击平均占了其投资增长减慢中的一半左右，对于大宗商品进口国来说，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减慢平均占了其投资增长减慢中的一半以上。

私营部门债务对GDP的比率过度地影响了投资：金融服务可得性提高（金融深化）对投资的益处不断地被过度负债的有害影响所超过。但几个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危机后债务的减少已经消除了这些投资增长障碍中的一部分。相对而言，在几个非能源大宗商品出口国中，过高的私人债务已经阻碍了投资。另外，不断上升的政治风险可能占了自2011年以来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减慢的1/10。

**不确定性的提高：**全球性和国家特有的两种形式的不确定性是拖累投资的主要因素：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其中，国内政策的不确定性阻碍了国内投资增长；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政策不确定性（比如欧盟，特别是对于欧洲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投资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

全球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可以用波动率指数（VIX Index，追踪美国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来衡量，是解释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路径的关键变量，尤其是在该指数持续上升的情况下。例如，波动率指数上升10%可能会极大地降低这些经济体的投资增长率（在一年内降低0.6个百分点）。

## 对增长的任何阻碍都会危及全球的减贫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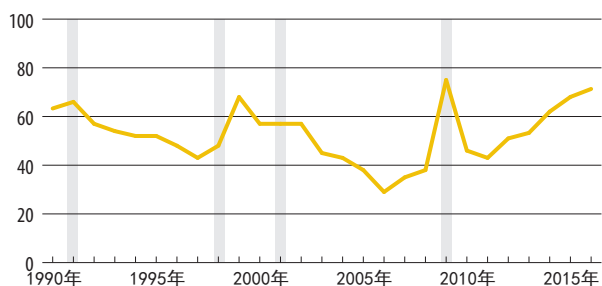
欧盟的数次政策不确定性（特别是在2010—2012年欧元区危机期间）对与其有密切关系的经济伙伴产生了溢出效应。例如，政策不确定性在2011年的6月到9月期间（欧元区危机的最高峰）显著提高。这种不确定性的快速提高可能降低了

图1

### 低于平均水平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过去三年的投资增长处于低水平。

(投资增长率低于长期平均值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所占比例, 百分比)



资料来源: 哈弗分析; IMF; 牛津经济研究院;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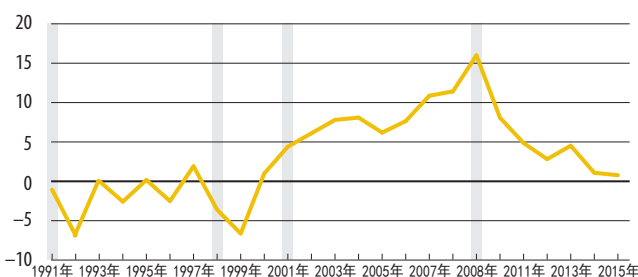
注: 长期平均值是指具体国家在1990年到2008年期间的水平。2016年数据为估计值。阴影部分表示全球衰退和不景气期间。

图2

### 不断下降

在2009年到2015年期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人均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幅度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投资增长率差异, 百分点)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注: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实际投资增长率差异的加权平均值。阴影部分表示全球衰退和不景气期间。

投资, 特别是欧洲和中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除了这些跨境不确定性溢出效应以外, 国内政策不确定性也加重了主要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疲软。

主要经济体的负面溢出效应: 在过去7年中, 美国和欧元区的增长疲软, 多次低于预期, 令人失望。鉴于这些经济体巨大规模及其与世界其他国家在贸易和金融方面的一体化程度, 其增长减

速会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造成显著的不利影响。

美国和欧元区疲弱的产出增长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造成如下影响: 在一年内, 美国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将会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次年的平均产出增长率降低0.8个百分点, 欧元区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则将会造成这些经济体次年的平均产出增长率降低1.3个百分点, 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投资增长率对此的反应是其产出增长率反应的两倍左右(达到2.1个百分点)。

另外, 中国的政策驱动型增长减速和从投资转向消费的再平衡措施也影响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产出增长。由于中国目前是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 因此中国的产出和投资增长减速也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影响。

例如, 在一年内, 中国的产出增长率每下降1个百分点会伴随着其他大宗商品进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出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 以及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产出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而且, 由于中国的很多投资都是资源密集型的, 因此中国降低投资的再平衡措施对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更大。

## 对未来增长的影响

金融危机后投资增长率从金融危机前的历史高点下降, 这会对长期增长产生持续的影响。由于降低了资本积累的速度, 长期疲弱的投资增长可能会妨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未来数年的潜在产出增长。在2009年,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与发展经济体之间的人均投资增长率差异为15个百分点左右, 而到2015年, 该差异几乎为0, 是21世纪初以来最低的(见图2)。而且, 因为增长是最有力的减贫方式, 所以对增长的任何阻碍都会危及全球的减贫目标。

除了使资本积累减速以外, 疲弱的投资还与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中不能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解释的部分, 反映了技术和效率的变化)增长减速相关, 因为一般来说投资对于采用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新技术非常关键。生产率减速最明显的是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以及投资增长率最低的经济体。而且, 较低的全要



素生产率增长也反映了较低的劳动生产率（每工作小时产出）增长，而劳动生产率是长期实际（扣除通货膨胀）工资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 如何加快投资增长？

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有大量未满足的投资需求（Kose 等人，2017），因为其中很多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差，难以满足快速城镇化和劳动者不断提高的需求。另外，从受自然资源（在大宗商品出口国）或没有开展对外贸易的部门（在一些大宗商品进口国）所驱动的增长要向更可持续性增长的顺利转型也需要投资的帮助。

## 很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有大量未满足的投资需求。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直接促进投资，也可以通过鼓励私人投资（包括外国直接投资）和采取措施，改善总体投资前景和营商环境来间接地促进投资。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劳动者方面的公共投资来直接促进投资可以帮助增加短期需求，提高长期潜在产出，改善私人投资和贸易环境。另外，公共投资还能帮助缩小收入差距，这也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而且在合适的条件下，公共投资还具备刺激私人投资的潜力（见图3）。

在间接促进投资方面，宏观经济政策可以通过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性、改善短期和长期增长前景来鼓励生产性投资。而且，更有效地采用被设计用来应对增长减速和下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可以通过提高产出增长来间接地促进私人投资，在大宗商品出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尤其如此。但是，如果政府缺乏增加支出或削减税收的资源，或者产出增长因为需要适应大宗商品出口收入长期下跌形势而表现疲弱，这些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会被削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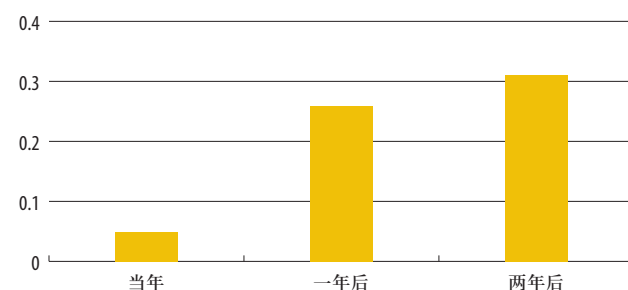
而且，要想促进投资的可持续性增长，上述政策还必须以结构改革为支撑，从而鼓励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国直接投资。结构改革可以包括很多

图3

### 刺激性投资

公共投资可以刺激私人投资。

（公共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所提高的私人投资，与基准值的差异，百分点）



资料来源：IMF；各国的数据；Kose, Ayhan, and others. 2017. "Weakness in Investment Growth: Causes,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99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注：公共投资增加所引发的私人投资积累效应是以8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6年第二季度期间的样本为基础。图中的条柱表示中位值。

领域，例如，减少企业准入的限制和降低创业成本，就可以让现有企业获得较高利润，让国内投资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得更大的效益；减少贸易壁垒的改革既能鼓励外国直接投资，也能鼓励总体投资；企业治理改革和金融部门改革还可以改善资本在企业 and 部门之间的分配；健全的产权制度也可以鼓励企业和房地产投资。另外，这些政策还应该以提高透明度（即采用更好的财务报告制度）的措施作为补充。FD

M.艾汉·科泽（M. AYHAN KOSE）是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研究部预测局的主任，弗兰齐斯卡·L.奥恩佐格（Franziska L. Ohnsorge）是该局的首席经济学家，叶蕾（LEI SANDY YE）是该局的经济学家。

#### 参考文献：

Kose, Ayhan, and others. 2017. "Weakness in Investment Growth: Causes, Implications, and Policy Response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990, World Bank, Washington, DC.





# 如果资金不再流动

有助于全球贸易和经济活动的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在某些国家面临巨大压力

安德烈亚·阿德里亚诺

安哥拉是非洲第三大经济体，依靠进口来维持经济运行。该国是重要的石油、钻石和铁矿石的出口国，也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医药、建材、汽车及零部件和生产资料。但该国的建筑等很多依靠进口的行业面临着停摆的风险，因为进口商经常发现难以向其国际供应商付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安哥拉遭受了去风险化的影响——去风险化是一个描述主要（而不是仅仅）影响小型发展中经济体多方面复杂问题的概念，让这些发展中经济体与全球金融网络的联系面临威胁。

想象一下，如果类似法国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等国际航空公司突然停止提供往来某个国家的航

线，而该国又没有自己的航空公司，要依靠这些公司往来其他国家，那么，该国的民众和经济就会因此受到如下影响：目前仍然往来该国航线的机票会涨价，使得其进出口费用和人员出行费用更高；而更少的直航航班和更高的机票价格会对旅游业造成不利影响。

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或多或少与人员的流动相似，并会通过一些相同的城市枢纽进行。例如，某人要从安哥拉的罗安达前往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他可以首先飞到欧洲，再飞到美国，最后飞到圣何塞（或者先到圣保罗，再到巴拿马城，最后到圣何塞）。而两个国家之间的电汇也在全球进行类似的流动，进行数次联系，通常在大型

全球性银行之间的网络内流动，这些大型全球性银行包括美银美林、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渣打银行等等。

如果全球性银行开始停止向某国当地银行提供电汇、信用卡结算，甚至外国硬通货等国际支付服务，去风险化就发生了。在全球支付系统中，提供上述服务一般就是指代理银行业务。没有代理银行业务，一家银行及其客户（该国的个人或企业）就会失去与全球金融网络的联系。

在当今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如果某个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无法在国际上流动，其结果不难预见。只要想象一下，在像加勒比海地区那些严重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如果其酒店突然无法处理客户的信用卡支付，或者航空公司无法支付燃料，结果会如何？实际上，加勒比海地区已经成为受到失去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

加勒比海地区银行业协会今年早些时候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该地区 12 个国家的 23 家银行中有 21 家都失去了至少一家代理银行业务关系，其中 8 家银行只有一家代理银行，但大多数银行都能够找到替代安排。另外，在非洲、东欧、中东以及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国家也已经失去了一些代理银行业务关系，比如伯利兹中央银行。在安哥拉，美元的稀缺已经影响到了贸易活动。甚至，菲律宾和墨西哥等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受到了影响。一项对阿拉伯国家的调查也发现，接受调查的 216 家银行中有 39% 遭受了“显著的”代理银行业务关系的大幅下降。

## 推动因素

法律要求银行要尽可能地防范洗钱、恐怖融资、偷税漏税、腐败收入伪装成常规跨境支付的可能性。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对上述要求的监管和执行更加严格，类似于经济和贸易制裁的执行，要求银行开展“了解你的客户”的调查。必要合规结构的成本非常高，以至于代理银行业务这种大规模低毛利的服务都可能无利可图。

还记得在“9·11”之后，甚至连婴幼儿在机场都要接受搜身安检的情况吗？或者，你还记得在鞋子炸弹事件以后，脱鞋安检成为美国机场的标准做法吗？全球支付的情况非常类似。银行要对经过其网络的所有国际交易负责，必须对风险客户的交易进行仔细检查，并且要明确停止“禁止交易名单”上客户的交易。这是因为违规的声誉风险相当大，而且罚款金额可能会高达几十亿美元。“违规的罚款和声誉上的损害相当可怕，”一家全球性美国银行的反洗钱专家告诉《金融与发展》杂志。是全球整体情况“造成了金融业的险恶环境”。

## 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不难预见发展中国家的结果。

对于银行来说，这只不过是在其众多业务条线选择过程中一项简单的风险回报分析，但是对于某个非洲内陆国家的某家小型花卉出口商来说，这关系到其业务的生死存亡。汇款是去风险化的另一个潜在受害者。对于贫困人口来说，汇款费用已经非常高了，但是如果提供汇款的银行减少，那么汇款费用就会变得更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一趋势不仅是全球性银行削减与本地银行之间的代理银行业务关系。例如，作为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共和银行 (Republic Bank) 决定取消转账业务，并且关闭西联汇款和速汇金等大型全球汇款提供商的账户。“这些公司曾是加拿大和美国巴巴多斯移民最爱使用的汇款公司，所以这些人可能已经受到了影响，”共和银行巴巴多斯分支机构的首席执行官伊恩·德·索萨 (Ian de Souza) 告诉本刊。

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汇款价格数据库的统计，平均来说，从美国向牙买加汇款 200 美元要支付 7.4% 的费用，从加拿大向牙买加汇款 200 美元要支付 10.1% 的费用，而从南非向安哥拉汇款 200 美元则要花费高达 20% 的费用。世界银行估



计，如果广大发展中经济体接收汇款的转账费用降低5个百分点，那么每年就可以节省160亿美元。

IMF最近的一份报告发现，跨境支付到目前为止已经保持稳定，经济活动也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是，少数几个国家的金融脆弱性已经进一步恶化，因为他们的跨境资金流动通过更少的代理银行关系而更加集中化，或者通过替代性安排加以维持，这些脆弱性可能会提高金融服务的成本，并且对银行评级产生不利影响，从而破坏受影响国家的长期增长和金融包容性前景。

例如，伯利兹的问题就已经达到了系统层面，该国的所有银行都受到了影响，其中最大的伯利兹银行已经依靠美国银行作为其唯一的代理银行长达35年之久，但是在2014年，美国银行通过一份提前60天的通知终止了该代理银行关系。“他们从来没有给我们说明具体的原因，只是说跟我们开展业务不再符合他们的战略。”该行副行长及首席风险官菲利波·阿拉里奥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

阿拉里奥认为大多数全球性银行都“不再对伯利兹感兴趣了。”为了维持运营，该行不得不“表现出创造性，开展大量的联络活动。”该行目前通过与其他一些国家的小型银行开展业务，其中有些银行的规模甚至比伯利兹银行都小，而且由不同的金融服务提供商提供不同的服务。“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但是并没有有效的长期解决方案。”他认为这一问题已经影响到了该国的整体经济，因为甚至当地的美国和英国军事训练营接收资金都存在问题。

对于美国银行来说，这基本上只是个规模问题，该行全球金融机构及公共部门银行业务负责人斯蒂芬妮·沃尔夫告诉本刊，但她并没有就具体的案例发表看法，只是表示该行对于不同产品和司法管辖区的风险监管方法，导致其必须更专注于具有更大增长潜力的客户，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适合于我们。”不过，代理银行仍然是其企业银行业务的主要组成部分，“从收入和业务组合多样化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她补充说，该行已经增加新客户，并且甚至在很多国

家提供硬通货流动性，这是代理银行风险较大的业务之一。

经常相互矛盾的金融法规，强化的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措施，全球性银行对监管要求缺乏明确性和一致性的认知，以及一些国家的高风险环境等因素的结合，使得去风险化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银行建立了很多评估金融交易风险的标准，因为声誉非常重要。例如，银行原则上可能认为哥伦比亚客户的风险比智利客户的风险高，因为前者具有贩毒集团的历史，一位美国的反洗钱专家表示。

某些业务也比其他业务的风险更高，比如赌场。“一般认为，现金密集型企业的风险高于更依赖于电子支付的企业，涉及政府订单企业的风险高于私营部门企业，政治家的风险高于律师，律师的风险高于企业经理。”他解释说。而所谓的政界人士风险非常高：内阁成员、立法者、国有企业的高管都要受到更深入更频繁的详细调查。

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强了其遵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建议的力度，该组织是制定和执行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标准和实践的政府间机构，不过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完全遵守了这些建议。有时因为政治环境，导致立法太宽松，这成为常见问题，实施不力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有太多的政治家及其家庭成员涉足商业，那么他们就没有兴趣批准规范政界人士的当地法规。所以，外国银行就更难以对一项交易进行恰当地审查，而该交易却可能会引起该外国银行面临自己监管机构的执法行动。然而，一些人认为国际压力可能是迫使改变这种情况的唯一方法。

## 找到替代路径

遭遇去风险化的银行会怎么做呢？就像顽强的旅客一样，去寻求替代的航班和线路。在大多数受影响的国家，银行都已经找到继续开展业务的方法，其中一种可能的方法是将其交易嵌入仍然有代理银行关系中介银行的交易中。例如，安哥拉目前就将更多的交易通过南非和葡萄牙进行



##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国家标准的持续改善对于达到代理银行所要求的信任水平也非常关键。

处理，而伯利兹的银行甚至要依靠土耳其的金融服务提供商。而如果一种货币稀缺，那么将外币进行多元化则是另一种选择。

但是，专家警告说，去风险化流程再次盯上这些银行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全球性银行可能会向一家葡萄牙银行询问其国内业务中所包含安哥拉交易的情况，而该葡萄牙银行可能最终会在去风险化流程中失去自己的代理银行账户。另外，由于中国正在努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因此如果人民币开始被人认为是可以用于未能通过美元和欧元“气味测试”交易的替代货币，那么中国将会非常苦恼。

最重要的是，短期措施的寻找可能会导致一些企业和银行采用非正统的方法，以及声誉不是非常好的金融服务提供商，以维持运营，这意味着最终会对更高透明度和更好全球治理标准的广泛追求造成损害。

长期可持续地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采取多方面的行动，涉及各国及国际机构，以及私营部门中大量不同的政策制定者。总的来说，受到去风险化影响的银行要提高自己的风险管理能力、宣传自己的进步、与全球性银行之间建立信任，这非常关键。而且，如果单个银行的能力难以达到标准，那么就需要采取合并交易流量和终止特定高风险业务条线等措施，来解决代理银行对于风险管理的关切。到目前为止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提高对去风险化问题复杂性和严重性的认识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伯利兹银行的阿拉里奥回忆说，当该行第一次跟美国监管机构和国际机构提出去风险化问题时，“各方都对我们大加责备。”

游说和采取多国联合行动，结合国际机构的更多研究成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同监管机构详细说明自己的要求是一个重要步骤，美国财政部去年8月发布的旨在让大量美国政府监

管机构要求达成一致的指引，被公认为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该指引澄清了并不存在零容忍要求，以及有很多罚款适用于故意不法行为。

人们已经提出很多用来解决去风险化问题的措施，其中包括通过行业计划来降低合规成本（技术可以帮助银行更好地了解其客户和提供汇款的替代渠道）。而且，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国家标准的持续改善对于达到代理银行所要求的信任水平也非常关键。

另一方面，全球性银行也在积极行动。例如，在亚洲拥有大量业务的英国渣打银行，就已经建立了代理银行培训项目，以帮助其客户（当地银行）及其客户的客户遵守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规范，该项目目前正在23个国家实施。

作为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墨西哥也受到失去代理银行关系的影响，但已经采取多方面的行动。例如，由于一些国家的隐私法律禁止同一全球性银行的分支机构之间交流客户风险状况信息，所以，墨西哥就修改了自己的法律框架，为这种跨境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另外，墨西哥还建立了其国内美元支付系统，并且使用其中央银行的代理银行关系来方便转账。

在航空运输业，更严格的安全措施意味着，以个人小小的牺牲换来更大范围的公众安全。因此也可以同样认为，更严厉的国际法规也能通过打击金融犯罪实现全球利益，但问题在于这些国际法规也可能影响到守法的个人和企业，而不仅仅是可疑的个人和企业。总之，最近出现的合法资金难以流通，正如合法个人难以旅行一样，这都是不应该发生的。**FD**

---

安德烈亚·阿德里亚诺（ANDREAS ADRIANO）是IMF信息交流部高级官员。

# 为改革加油助力

虽然能源补贴改革面临挑战，但很多国家仍在这方面取得了进步

能源补贴是旨在降低能源消费和生产的成本的一个政策手段。2015年，这类补贴占全球GDP的6.5%，约5.3万亿美元。补贴有诸多经济和环境方面的负面影响，主要使最富裕的家庭从中受益。尽管如此，事实却表明很难减少或取消补贴。但近年来，一些因素促进了能源补贴改革：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乏力；2014年中期能源价格暴跌，至今仍处于低价格水平；2015年12月190个国家签署了“巴黎协议”，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事实上，32个国家自2014年年中以来已经切实对其能源补贴进行了改革。其中，超过半数石油输出国家，它们不得不因石油收入的减少而进行补偿。大多数这类石油输出国面临着比石油进口国更严重的财政赤字。而对某些国家来说，

环境因素则是另一个驱动因素，尤其是那些已经引入碳税，在现有系统之上提高碳税价格，或者宣布采用其自己的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国家。并且，最近的改革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这使其更容易获得成功。

根据IMF的研究，有关补贴的改革想要获得成功，需具有六个元素：有清晰的长期目标的全面计划；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公开透明的交流；逐步降低价格；更高效的国有企业；保护穷人的措施；以及非政治化的定价机制。

然而，就算同时满足这六个元素，想要改革获得成功需要怎么做呢？大部分可持续的改革都是由诸如环境问题等长期因素所驱动的，并辅以额外的措施（例如，自动燃料定价或自由化）且经过认真设计以应对造成的社会和经济影响。<sup>FD</sup>

## 为何能源改革如此重要？



能源价格正常可以：

使全球碳排放量减少

**24%**

使化石燃料大气污染死亡减少

**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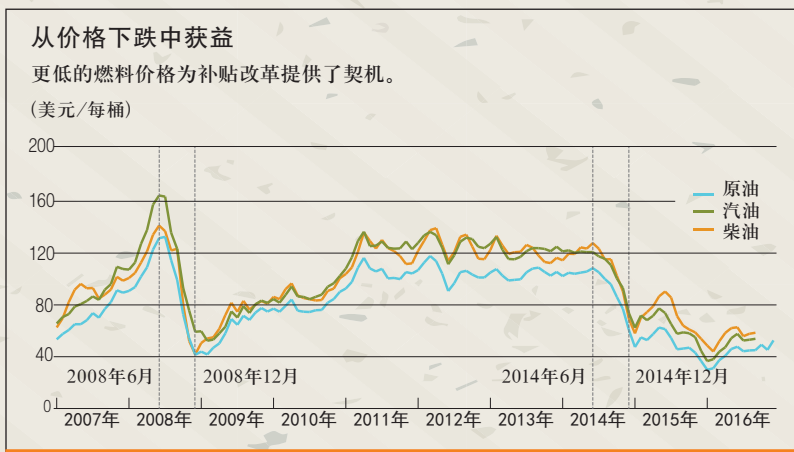
使全球GDP上升 **3.5%**

这样可使国家减少低效的税收或者优先增加健康卫生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

补贴使富人大大受益，并加剧了 **收入不平等**

# 何时是适合的时机？ 现在！

自2014年中期起，国际能源价格的暴跌为能源进口国取消其补贴并进行补贴改革提供了一个契机。



2015年，超过190个国家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这为进行补贴改革提供了另一个契机。

# 已实施了哪些改革？



提高国家定价 (安哥拉、埃及、乌克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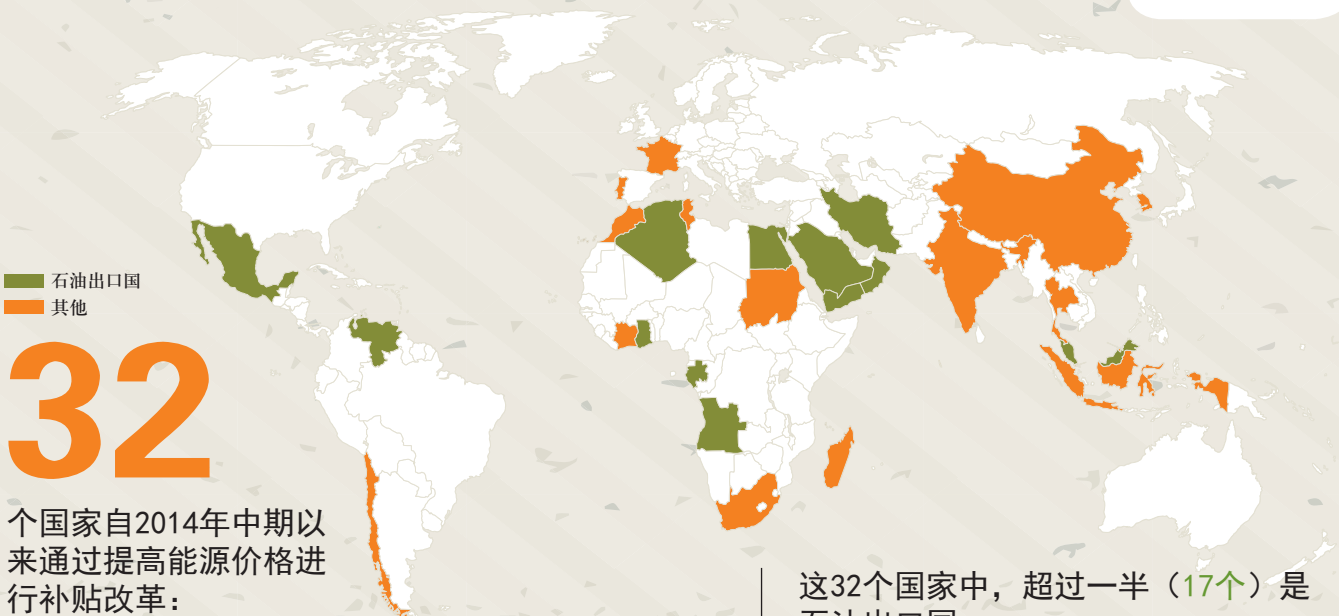


放开能源价格或者引入自动定价机制 (印度、马达加斯加、阿联酋)



引入排污权交易制度或碳税，或提高碳价 (墨西哥、葡萄牙、南非)

# 哪些国家正在进行改革？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林、智利、中国、科特迪瓦、埃及、法国、加蓬、加纳、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科威特、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阿曼、葡萄牙、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南非、苏丹、泰国、突尼斯、阿联酋、委内瑞拉、也门

这32个国家中，超过一半（17个）是石油出口国

本文由玛利亚·约瓦诺维奇 (MARIA JOVANOVI) 撰写。本文基于 IMF 财政事务部的 Amyra Asamoah、Emine Hanedar 和 Baoping Shang 的研究。欲知 IMF 有关能源补贴改革方面的内容，请登录 [imf.org/subsidies](http://imf.org/subsidies)。



展开意义深远的长期性经济改革并非易事。改革的成效通常在数年之后才显露出来，而其带来的痛楚则是马上可感受到的。在我们新的“前沿”系列里，政策制定者描述了在推进旨在提高经济增长率、生产效率以及创造更多工作岗位的改革中所面临的挑战。



照片：PETER ANDREWS/REUTERS/NEWS.COM

## 机会之窗

### 莱谢克·巴塞罗维奇解释为什么在当公民愿意接受变化的时候迅速采取行动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波兰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的设计师，莱谢克·巴塞罗维奇 (Leszek Balcerowicz) 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研究改革该国苏联风格体制的方法。之后，他成为团结工会运动的顾问。在 1989 年至 1990 年期间，巴塞罗维奇担任了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财政部部长以及副总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东欧的首个非共产主义政府。在 1997 年至 2000 年期间，巴塞罗维奇又再次担任上述职务，并于 2001 年至 2007 年期间出任央行行长。他在华沙中央规划和统计学院（现华沙经济学院）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目前仍在该学院任教。

在本次接受《金融与发展》杂志 (F&D) 的采访过程中，巴塞罗维奇 (LB) 回顾了他第一次出任财政部部长时的工作强度，并讲述了他是如

何设法通过充分利用“非常政治”的狭窄窗口来克服所面临的障碍。

**F&D:**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您组建了一支经济学家团队来研究改革现有社会主义体制的途径。您说过这项工作就像一个业余爱好，因为改革的前景可能很渺茫。1981 年 12 月国家实施了戒严法。之后发生了什么？

**LB:** 在实施了戒严法之后，就没有开展任何一项重大改革的希望了……但是，我们仍然持续开展工作，不过这次我们突破了所有限制条件。所以，我们研究了私有化、自由化和财政改革……当然，那时我们没有想到这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发挥作用。

**F&D:** 之后，团结工会和共产主义政府之间开展了所谓的圆桌谈判，再接下来就进行了选举，并产生了由团结工会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主持的新政府。您曾经讲过您会接受这项工作，但必须要满足某些特定条件。那么是哪些条件呢？

**LB:** 首先，经济改革应该是大规模、迅速且彻底的。其次，我要带着我的团队进入政府。再次，我以副总理身份担任内阁会议经济委员会主席，来协调所有经济部门的工作。与此同时，我接受财政部部长这一职位。此外，我要在“谁掌管经济部门”方面具有发言权。

**F&D:** 您当时对经济形势做出了怎样的评估？

**LB:** 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产出不断下降。我们当时存在恶性通货膨胀，背负着沉重的外债。而且，在我接受这个职务之后，我才发现情况其实更加糟糕，因为我发现我们还存在着一些隐藏的国内债务。

**F&D:** 您是怎样进行战略抉择的呢？

**LB:** 首先，我们清楚……一旦一个国家遭遇恶性通货膨胀，就必须迅速减缓印钞速度。其次，通过研究之前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我们了解到，在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国家中，最开始实施的变革必须非常迅速且规模庞大，（我们也知道）变革不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各项重大变革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基本在同一时间启动。

**F&D:** 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呢?

**LB:** 1989年波兰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在此之后, 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时期, 我称之为“非常政治”, 这是一个机会窗口。如果您愿意, 人们比常规状态下更加愿意接受激进的变革。我们在波兰广泛领域内所采取的迅速行动就是对这一历史所馈赠礼物的最好利用。经济的超快速稳定和大规模自由化包括取消大部分国内垄断……

**F&D:** 当您刚刚就职时, 您遇到的最迫切的挑战是什么?

**LB:** 主要问题是整治恶性通货膨胀。从技术层面上讲, 这一点是容易做到的, 我们必须减慢印钞速度, 所以主要的挑战是财政方面的。与此同时, 我们引入了央行的独立性原则。

**F&D:** 那货币方面情况如何? 当时货币还不是可自由兑换的, 而且当时的美元黑市还相当活跃。

**LB:** 我们启动的最重大的改革之一是统一汇率并使货币实现自由兑换。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革命, 因为人们就可以合法地进口产品了。因此, 增强了供应方面的竞争。

**F&D:** 您当时是如何决策汇率制度的?

**LB:** 有一段时间我们选择了固定汇率, 但是非常难以抉择。当时IMF持这样一种观点, 即波兰需要一个名义锚来终止恶性通货膨胀, 这一点我那时是接受的。当然, 要想确定波兰兹罗提应该稳定在怎样的一个汇率水平上是极为困难的, 但是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F&D:** 您当时刚刚步入政坛。那么您是怎样实现过渡的呢?

**LB:** 我不是为了从政而从政。当时我是被请去做一项工作的, 而这项工作具有历史性重要意义。我们不需要开展大量的公共传播和劝导, 因为我们团结工会运动占据着议会多数席位, 而且无需进行大量的解释而延缓变革, 这会浪费宝贵的时间。因此, 从政治角度上看, 这是非常轻松的。

**F&D:** 当时有100万人丢掉了工作。您对这一政治成本是否感到担心呢?

**LB:** 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广为传播, 因为, 首先, 人们将社会成本与改革联系起来, 但其实延迟改革会带来更大的社会成本……其次, 关于就业, 你需要了解当时在社会主义企业之中存在着大量隐性失业, 而且, 一些隐性失业之后被公开了。再者, 最初的有关失业津贴的法律过于宽松。

**F&D:** 波兰改革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LB:** 在过去的300年间, 波兰在经济上一直落后于西欧, 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差距在不断扩大。直到1989年, 我们才借助市场改革, 开始奋起直追。1989年, 我们的人均收入为德国的大约30%, 后来增长到近60%。这是过去三个世纪中波兰首次与西欧趋近。

**F&D:** 当时您是否担心选民会将经济阵痛归因于改革?

**LB:** 在刚开始的两年中, 并未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抗议, 政治抗议也很少。随着时间的推移, 正如在每个国家都会发生的那样, 总有一些政治家, 他们试图通过对其称之为严厉或不人道的经济改革加以批评来捞取政治资本。

**F&D:** 是否存在一些您希望能够进行改革但当时未被触及的领域?

**LB:** 如果当时我能够与更多的人并肩作战, 我们可能会对遗留下来的社会体制、养老金改革和医疗改革进行更多的变革。

**F&D:** 您的这种经验对当前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否具有参考性?

**LB:** 目前有很多被国有部门主导的准社会主义经济体……这些国家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与波兰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989年时的情况具有可比性。

**F&D:** 当回顾这一时期的时候, 您对您本人所发挥的作用有哪些反思?

**LB:** 即便在1989年年初, 我也没有奢望波兰会变得自由, 我可以在国家转型中扮演某种角色。当然, 这并不容易, 但是如果发生了某些超出你设想的状况, 你也不能抱怨。**FD**



# 新闻热点的背后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移民对其来源国和目的国都产生了广泛的积极作用

赫苏斯·冈萨雷斯-加西亚、蒙特福特·姆拉奇拉

国际移民在过去几年中已经成为新闻热点：前往欧洲的难民激增，尤其是来自中东和非洲国家的难民，加剧了持续的难民危机。但这遭到了很多国家的抵制，其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国家。

相对于人口规模而言，发展中经济体一般比发达经济体接收更多的移民。虽然难民成为新闻热点，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长期移民，无论是在该地区内部的移民还是前往世界其他地区的移民，都对非洲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 2013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生活在本国以外的人口为 2000 万人左右，是 1990 年是两倍，

其中有 1300 万人是该地区内部国家的移民(见图 1)。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劳动适龄人口(通常是移民的来源)的快速增长也意味着这一趋势将持续几十年。另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目前 2% 的移民率(移民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虽然低于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平均 3% 的水平，但还是与该地区总人口快速增长保持一致，该地区的总人口已从 1990 年的 4.8 亿左右增长到 2015 年的约 9 亿元。

### 这些移民都去了哪里？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在该地区内部国家之间流动(见图 2)。因经济原因而迁移的人倾向于到更富裕的邻国去寻找机会。

为什么非洲人更多地是选择移民到其他非洲国家，而不是到更富裕的国家呢？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因为这些人比较贫穷，买不起前往欧洲和美国的机票，只能乘坐大客车和卡车，而且非洲内



部的边境控制非常松懈。另外，同类的文化和语言也起了作用。

## 被迫移民

1990年以来，非洲地区的难民（逃离战争或迫害的人）数量非常低，无论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还是在其他非洲地区都是如此。在199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一半的移民是难民，但到2013年该比例只有10%，这得益于该地区大规模冲突数量的降低（见图3）。

下列五个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是非洲内部难民的主要来源：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苏丹和南苏丹。其中，索马里难民去了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苏丹难民去了乍得，南苏丹难民大部分被安置在该国其他地区，而一部分去了乌干达。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设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难民营所在国为此花费了大量的财政支出，预计占其GDP的1%—5%。

不论是被迫移民还是因经济原因的移民，都会带来摩擦。接待难民的费用以及接受大量移民的国家的社会矛盾难以解决，因为这些移民都在寻求工作、服务和机会。

但是前往世界其他地区移民的增长速度正越来越快，高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内部的移民增长速度。在2013年，有约660万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移民（占该地区全部移民的1/3）生活在该地区之外，是1990年的两倍以上。而且，移民的构成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90年，只有40%的移民是出于经济原因，而到2013年，该比例上升为90%。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全球移民数量是世界上最低的，只占该地区总人口的0.7%，这一比例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1/7，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1/4。

## 为什么要移民？

非洲内部移民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地缘相近、收入差距、移民来源国的战争与目的国政治稳定的比较、文化上的联系以及干旱或洪水等环境因素。科特迪瓦和南非位居该地区内部移民的最大接收国行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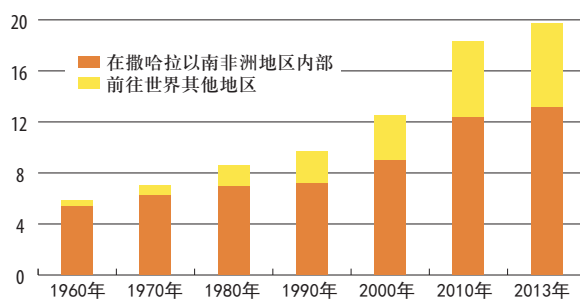
前往世界其他地区移民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寻找经济机会，主要目的是发达经济体。撒哈拉

图1

### 移民在行动

前往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以外国家的移民数量在不断增长，但仍占少数。

(存量, 百万移民)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移民和侨汇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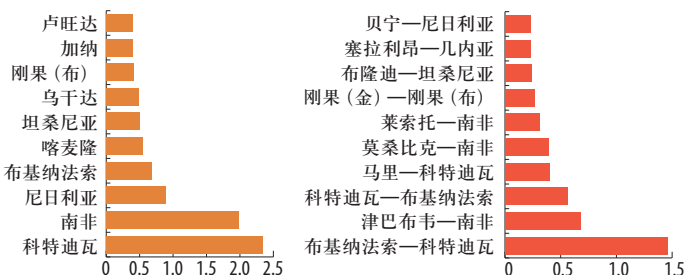
图2

### 靠近家乡

科特迪瓦和南非接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移民中的大多数。

(2013年最大的移民接收国, 存量, 百万移民)

(2013年最主要的移民路径, 存量, 百万移民)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移民和侨汇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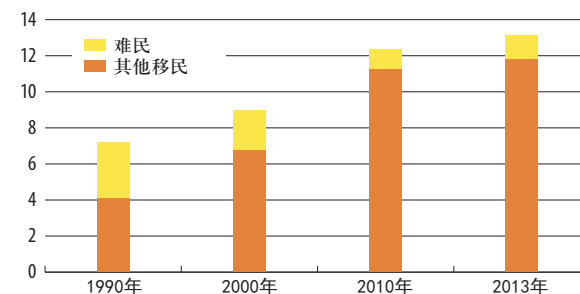
注：刚果(金)指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布)指刚果共和国。

图3

### 找工作的移民

难民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内部移民的比例比25年前更低。

(存量, 百万移民)



资料来源：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数据库；世界银行，移民和侨汇数据库。

以南非洲地区向世界其他地区移民中的85%都是前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其中法国、英国和美国接收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移民中的近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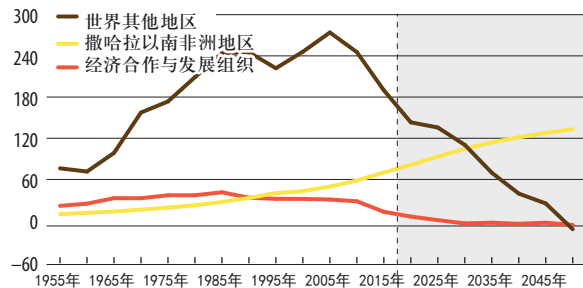
侨汇是移民来源国的最大收益。在过去20年中，来自于侨胞的资金流入迅速增长，目前已

图4

## 虚位以待

随着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劳动适龄人口的持续下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可以通过移民为其提供劳动力。

(5年间的累积变化, 百万人)



资料来源: 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

注: 图中阴影部分为预测值。

成为该地区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外来资金来源之一, 2015年占其GDP的3.5%。而且, 侨汇似乎也超过了外国直接投资, 成为该地区发展中经济体最大的外汇来源, 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急剧下降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原因。

在经济不景气时期, 侨汇一般比外国直接投资和官方发展援助更有韧性。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侨汇只在2008年和2010年小幅下降, 并且在2011年恢复, 其后保持增长态势。

侨汇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宏观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一些经济体的主要外汇和收入来源, 例如, 侨汇对冈比亚、莱索托和利比里亚GDP的贡献就超过了20%。侨汇为贫困家庭补充了收入。贫困家庭可以储蓄部分侨汇, 投资于人力资本和有形资本, 从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生产率 and 经济增长。另外, 侨汇还有助于减轻自然灾害和冲突带来的宏观经济冲击。

但是, 移民也确实给其来源国造成了损害, 因为技术熟练工人和合格工人的离开所造成的人才外流降低了其生产能力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

## 不断演变的人口统计因素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统计因素变化将进一步改变移民的情况, 因为不仅是该地区的人口会持续快速增长, 从2013年的约9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20亿人, 而且其中的劳动适龄人口通常是移民的来源) 也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增长, 从2013年的约4.8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13亿人(见图4)。这些变化反映了该地区持续的人口增长(总人口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经增长了4倍)、不断下降的生育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降低, 其中目前婴儿死亡率是2000年时的一半。

这些人口统计因素的变化趋势, 以及撒哈

拉以南非洲地区与发达经济体之间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 可能会驱动更多人移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移民相对于其经合组织目的国总人口的比率预计将增长5倍, 从2010年的约0.4%增长到2050年的2.4%, 这是由于来自该地区移民数量的增长与经合组织国家人口增长减速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 更好的政策

移民劳动者有助于目的国的经济增长, 尤其是对于那些快速老龄化的国家 (Jaumotte、Koloskova 和 Saxena, 2016)。移民劳动者还可以给其目的国带来额外的税收收入和支持其退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缴款。另外, 给来源国的侨汇将继续支持其亲属的生活水平, 帮助减轻贫困, 作为稳定的外汇来源发挥重要的作用。

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内部和对外移民在未来几十年可能将继续增长, 因此相关国家必须制定政策, 帮助移民劳动者在社会和经济方面适应目的国的环境, 从而让所有人都受益。

人口增长需要来源国制定创造就业的政策, 而对于移民目的国来说, 移民劳动力的增长应该在某种程度上对其老龄化和不断下降的国内人口提供补充, 从而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都有利。而且, 经济增长和税收的提高会将担心移民会取代当地劳动者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最小化, 另外, 对接纳难民国家提供国际支持所增加的财政支出, 也会最终间接地降低财政支出和其他相关社会成本。FD

赫苏斯·冈萨雷斯-加西亚 (JESUS GONZALEZ-GARCIA) 是IMF非洲部高级经济学家, 蒙特福特·姆拉奇拉 (MONTFORT MLACHILA) 是IMF驻南非高级代表。

### 参考文献:

Gonzalez-Garcia, Jesus, and others. 2016. "Sub-Saharan African Migration: Patterns and Spillovers." IMF Spillover Note 9,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Jaumotte, Florence, Ksenia Koloskova, and Sweta Saxena. 2016. "Impact of Migration on Income Levels in Advanced Economies." Spillover Note 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ashington, DC.



# 从饥饿到超重

肥胖和糖尿病是新兴经济体的严重威胁，但可以采取正确的政策进行有效管理

爱德华多·J.戈麦斯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的繁荣，肥胖和二型糖尿病（以前称为成人糖尿病）等“富国”病给这些国家向好的经济前景带来了新的威胁。

例如，最近几年，巴西比印度、中国和墨西哥在加强防治政策的政治承诺方面做得更好，这得益于与市民社会的持续合作。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类似的因素导致这些国家肥胖率和二型糖尿病大量增加。国际贸易的增加使得所有人都更容易获得含大量脂肪的食物。计算机和移动设备等技术使得人们的体力活动减少，导致增重；在大多数国家，缺乏公园、糟糕的环境状况等使得人们更加不愿意去锻炼身体。

墨西哥约有1/3的人肥胖，其肥胖儿童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预计2050年墨西哥二型糖尿

病人数量将翻番。印度肥胖人数也急剧上升，城市及贫困乡村的儿童都受其影响。印度的二型糖尿病比率已经达到20世纪70年代的10倍，在2030年预计将有1亿名糖尿病病人。在中国，超过1.2亿人肥胖，其糖尿病人口居世界之冠（French和Crabbe，2010）。巴西的肥胖和二型糖尿病比率在过去20年里也出现上升。

## 高额成本

肥胖和糖尿病成本高昂。在墨西哥，肥胖及其相关疾病每年对政府医疗保健系统造成的支出在43亿到54亿美元之间。糖尿病的支出在也从2005年的3.18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3.43亿美元。在2012年，墨西哥政府还花费了约40亿



## 政府的回应

美元来应对与糖尿病有关的问题（例如高血压和心脏病），包括治疗、初级保健服务和研究。墨西哥萨尔瓦多祖比兰国家医疗与营养学院（Mexico's Salvador Zubir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dical Science and Nutrition）的阿布拉多博士（Abelardo）表示，如果得不到控制，那么到2030年，这些成本将摧毁整个医疗保健系统。

在印度，肥胖将给政府的医疗卫生预算带来沉重的负担，并且由于患者工作时间的减少而影响其经济发展。另外，印度政府花在二型糖尿病患者上的平均支出在2010年为250亿美元到380亿美元之间，主要为医药费和住院费（Yesudian等人，2014）。接下来的十年里，印度政府预计将花费2370亿美元用于糖尿病、中风和心脏疾病有关的医疗保健。

中国政府在2009年用于肥胖患者的医疗费用估计为35亿美元。近期的估计表明，糖尿病治疗每年花费中国政府约250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470亿美元，这可能轻易压垮其医疗卫生系统。

巴西政府用于治疗肥胖患者（通常是作为治疗其他疾病的一部分，如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癌症）的费用从2008年的540万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004万美元，预计到2050年可能达到100亿美元。另外，巴西治疗二型糖尿病的费用（包括住院费、诊断测试费、初级保健服务费）也从2008年的2001万美元增长到2011年的2830万美元，其中药品费用占一半左右。

墨西哥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团体在2008年同意：推广更健康的饮食和开展体育锻炼，以预防肥胖和糖尿病。而且，该国卫生部也在2014年实施了一项预防和控制超重、肥胖和糖尿病的国家战略，推广健康生活方式，改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建议制定相关法规和财政政策，例如征收快餐税。同年，该国国会批准了汽水税，对每升汽水征收1比索的税，同时还对高卡路里食品征收8%的税。

但这些税仍未能阻止墨西哥人对含糖饮料的热爱：消费量实际上从2014年的194亿升小幅上升到了2015年的195亿升。此外，其公共医疗保健系统仍然缺乏足够受过培训的员工和可靠的获得糖尿病药物的途径。这迫使很多病人即使能够获得政府提供的医保，也要自掏腰包。

印度卫生与社会福利部在2008年制定了几项肥胖和糖尿病预防计划，其中包括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国家项目以及心血管疾病和中风项目，重点在于早期诊断、转变行为生活方式和改善初级医疗保健服务等方面。但是，由于医疗基础设施不足、缺乏专科医生和初级医疗保健人员的持续短缺，妨碍了政策的落实。

中国卫生部与学校合作，改善学生营养，加强学生的体育锻炼，并且在2010年推出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项目，与省级政府合作推广体育锻炼和合理膳食。另外，《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年）》也推动采取措施，改善学校的营养和体育锻炼，加强基层医疗卫生系统建设，提高媒体意识，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只有25%的糖尿病患者得到适当的治疗，例如获得可靠的药品和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尽管过去十年实行了上述肥胖和糖尿病项目，但并没能有效提高公众的意识、推广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糖尿病早期诊断。另外，卫生保健人员的持续短缺（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以及卫生部与省级政府之间缺乏良好的协调也进一步妨碍了政策的实施。

巴西卫生部在2010年制定了战略行动计划，来防治非传染性疾病。该计划制定了合理膳食指南，增加了提高肥胖意识和学校营养项目的联邦资金，还为医疗保健人员提供了实施预防项目的资金。而且，巴西还在2007年通过了免费提供糖尿病药品的法律，这在中国、印度和墨西哥都是没有的。2011年巴西再次通过“健康无价”项目扩展了医疗的可获性。卫生部坚持其关于糖尿病的监控、预防、药品和初级医疗保健的承诺。上述政策加上人员



充足的初级医疗保健团队与州政府、学校和家庭的密切合作，极大地增加了药品供应和预防服务（Gómez, 2015）。

## 面临的困难

墨西哥的政策缺点反映了政治问题。尽管墨西哥政府内部存在共识，认为必须应对肥胖和糖尿病问题，但是由于快餐业的积极游说以及政府对经济增长的重视，意味着卫生部缺乏实现政策目标所需的国会支持。另外，墨西哥健康和营养联盟是由 20 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团体，旨在提高公众意识和游说政府进行政策改善，尽管该联盟作出了很多努力，但缺乏有影响力政治家的支持，同时也只有有限的组织资源，从而妨碍了其影响政策的能力（Barquera, 2013）。

在印度，由于议会没有就肥胖和糖尿病是否真正带来了公共健康威胁形成共识，政府仍不愿意作出改革政策的政治承诺。因为在印度，大多数人仍然处于营养不良和贫困状态，而肥胖和糖尿病患者都是相对富裕的人。另外，非政府组织在影响政策方面也不成功，这主要反映了政府没有兴趣考虑非政府组织的观点，同时也反映了非政府组织缺乏组织资源和管理能力。

在中国，尽管政府越来越重视防控肥胖和糖尿病，但有些政府工作人员主要关注的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国家安全，而不是公众健康。由于缺乏有效的责任制，政府工作人员也没有很高的积极性来加强卫生部政策的实施。

另外，也没有非政府组织来游说政府改善其肥胖方面的政策，卫生官员们也没有承诺要采纳这些组织的政策观点。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虽然组织良好，资金充足，但主要专注于研究和提高公众意识，而不是批评和游说政府。

与之相对，巴西政府对应对糖尿病和肥胖方面的政治问题处理得当。巴西国会历史上长期承诺实行全面医保，结合其卫生部在处理贫困和营养不良问题方面的良好记录，为实行政策打下了良好基础。和中国、印度、墨西哥不同，这种政治支持不仅仅停留在早期国会辩论阶段或政府对糖尿病和肥胖的危险性的认同层面，还扩展到了在基础医疗服务的创新。巴西是唯一在创新政策响应方面被国际肥胖工作小组认可（在 2010 年）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在 21 世纪初，巴西营养协会和巴西糖尿病学会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也促使其卫生部

通过相关支持性法律。与中国、印度、墨西哥不同，卫生官员也致力于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通过食品和营养安全全国委员会提供政策建议。

肥胖和二型糖尿病对巴西、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的公众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政治领导人已经实施了创造性的防治项目，但是，除非这些项目得到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同时像巴西一样与非社会团体形成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否则这些政策将无法实现其目标，从而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病例及其给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和经济体系带来的支出不可避免地增加。

因此，为了确保获得健康的高效劳动力，政治家们必须强化其有效实施相关政策的承诺，同时向社会团体和国际社会学习。

---

爱德华多·J·戈麦斯（EDUARDO J. GÓMEZ）是国王学院国际发展部副教授，是即将出版的新书《健康的地缘政治学：金砖国家应对肥胖、艾滋病和肺结核》（*Geopolitics in Health: Confronting Obesity, AIDS, and Tuberculosis in the Emerging BRICS Economies*）的作者。

### 参考文献：

- Barquera, S., I. Campos, and J. A. Rivera. 2013. "Mexico Attempts to Tackle Obesity: The Process, Results, and Push Backs and Future Challenges." *Obesity Reviews* 14 (2): 69–78.
- French, Paul, and Mathew Crabbe. 2010. *Fat China: How Expanding Waistlines Are Changing a Nation*. New York: Anthem Press.
- Gómez, Eduardo J. 2015. "Understan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azil's Response to Obesity: Institutional Conversion, Policy Reform, and the Lessons Learned." *Globalization & Health* 11 (24): 1–14.
- Yesudian, Charles, Mari Grepstad, Erica Visintin, and Alessandra Ferrario. 2014. "The Economic Burden of Diabetes in India: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Globalization and Health* 10 (80): 1–18.





# 战胜 埃博拉

## 经济领域的敏捷行动是克服埃博拉危机的关键

穆罕默德·坎古尔、卡洛·卓勒维齐、因德吉特·希恩

2014年3月，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病毒疫情爆发，给西非地区和国际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从2013年年底到2016年年初，该疫情夺去了超过1.1万人的生命，感染人数超过2.8万人（见图1）。

而且，埃博拉也导致出现经济危机，因为疫情引发巨额卫生和社会支出，并且几乎同时伴随着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受埃博拉疫情的影响最为严重，而且其卫生和社会系统在疫情爆发前就已经倍受压力，疫情爆发后更是不堪重负。

### 史无前例的疫情

世界对埃博拉疫情的反应非常迟缓。尽管已知首名患者于2013年12月在几内亚被感染，但是直到3个月后的世界卫生组织才正式宣布了埃博拉疫情在该地区爆发。而到那个时候，埃博拉病毒已经扩散到邻近的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因为西非地区的国家边境形同虚设，人口流动性非常高。

由于埃博拉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因此死亡人数开始急剧上升。到2015年3月底，死亡人数达到1万人以上（见图2）。虽然平均死亡率为40%左右，但疫情初期的死亡率高达70%。



随着死亡人数的上升，埃博拉疫情受灾国家的政府开始努力控制该病毒的扩散。但由于西非地区缺乏处理如此大规模公共卫生灾难的经验，造成提供紧急医疗保健的财政能力有限，此外对病毒传播方式的不了解以及可能导致疫情扩散的丧葬方式，都给该地区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另外，国际卫生机构对控制疫情扩散的方式也意见不一。在疫情爆发初期，当地政府卫生机构的诊断和正式宣布疫情的延迟也造成了国际支持的动员速度低于原来保证的水平。而且，缺乏疗法或疫苗使得对埃博拉疫情的控制变得更加复杂。此外，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马里，甚至远至欧洲和美国，都出现了埃博拉病例的情况，这也加剧了对爆发全非洲疫情，甚至全球疫情的担忧。

### 经济活动急剧减少

随着疫情的扩散，旅游活动减少，外国直接投资下降，贸易和服务急剧减少，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而且，尽管农业生产（主要用





于自给自足)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农产品贸易也因大规模的隔离检疫措施而受到严重影响。一些村庄和社区完全被封锁,以隔离和限制埃博拉病毒的传播,有的甚至长达几个月,因为该病毒极难控制。

另外,隔离措施也造成了食品的严重短缺。据报道,在2015年6月,有2/3的塞拉利昂家庭难以获得食物。而且,隔离检疫和关闭国家之间的边境也导致区域贸易暴跌,例如,几内亚向塞内加尔出口的土豆数量在2013年9月到2014年8月一年之中就下跌了90%以上。同时,需求的暴跌,对商品和人员流动的限制以及投资的推迟或取消,都进一步加剧了失业。

在三个受灾国家,埃博拉疫情爆发时期伴随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2015年,塞拉利昂的GDP下降20%以上。几内亚和利比里亚的GDP增长率的下降幅度相对较小,因为其矿业生产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三个国家的中期经济增长预计将严重受损(见图3)。

因为经济活动剧减,这三个埃博拉受灾国家的公共财政急剧恶化。在2013年到2015年期间,

三国的政府收入平均下降幅度为其GDP的3个百分点,其中利比里亚的下降幅度最大。而且,在此期间,由于提供紧急医疗保健服务和加强疫情控制措施,三国政府的公共支出的平均增加幅度也接近其GDP的5个百分点,其中利比里亚的增加幅度最大,超过了其GDP的9个百分点。

## 快速灵活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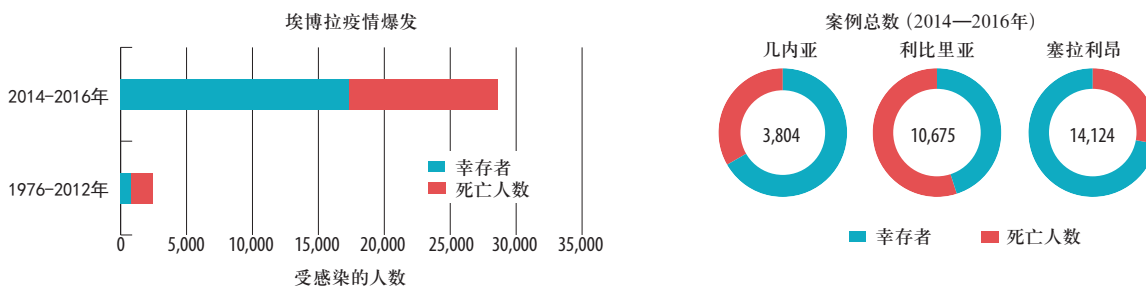
随着埃博拉疫情影响的升级,全球协调的反应和救援行动对于遏制疫情的扩散非常关键,对于减轻受灾国家民众的苦难和经济恶化程度也非常重要,因为这些国家当时仍处于战争和政治不稳定的恢复期。国际社会响应的重点在于处理卫生应急问题和提供财政支持,其中包括59亿美元的援助。

最直接的关切是向受灾国家不堪重负的国内卫生机构快速提供医疗援助。例如,由于此前已经在该地区开展了良好的活动,无国界医生组织在2014年3月就开始建立隔离设施,并且为不断增加的埃博拉患者提供临床救治。在其参与救

图1

## 史无前例的卫生危机

2014—2016年，埃博拉病毒导致1.1万人丧生，而之前的40多年里因该病毒疫情爆发致死的人数不足1600人。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援的最高峰，为了在这三个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该组织雇用了将近 4000 名本地员工和超过 325 名外部专家。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也与全球疫情警报和响应网络合作，作出迅速反应，动员和派遣医疗专家支持当地的医院。其中，全球疫情警报和响应网络是一个由公共卫生专家、联合国机构、国际卫生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网络。

同时，大量的财政支持也通过很多渠道提供给受灾国家。例如，联合国就设立了应对埃博拉多伙伴信托基金来筹集资金，并且提供一般性财政机制。该基金从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筹集了超过 1.66 亿美元的资金。另外，世界卫生组织也从 60 多个捐助者那里获得了 4.59 亿美元的捐款，这些捐助者包括美国、英国、欧盟、世界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等。

IMF 是首个为受灾国家政府预算提供融资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其授权职责内，IMF 为这些国家政府提供金融支持，这对于持续提供诸如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主要的政府服务而言至关重要。由于保证政府预算的直接来源存在财政压力，因此 IMF 决定直接向这些国家政府提供融资，而不是按照该组织的通常做法，向这些国家中央银行提供资金来支持其国际储备。这些直接融资使受灾国家政府能够为遏制疫情扩散的措施提供资金，并且保障关键的社会和基础设施支出。

IMF 在自 2014 年 9 月起的三个阶段中共提供了 3.78 亿美元的资金，正好是在疫情开始加快速度传播之前。随着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及对经济的影响逐渐明显，即使在当时疫情的经济影响证据尚不充分的情况下，IMF 仍旧率先认定无所作

为的风险实在太高。而且，IMF 提供的资金中还包括 2015 年 3 月对埃博拉受灾国家将近 1 亿美元的债务免除，具体通过一家信托基金提供，该信托基金是为了向遭受公共卫生灾难打击的国家提供援助而迅速设立的。

2016 年 6 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所有三个埃博拉受灾国家的疫情都已经结束，而且当时几内亚和塞拉利昂的经济增长已开始增强。不过，利比里亚的经济增长仍然没有恢复，主要是因为活动的减少以及对自然资源部门的投资。

## 经验教训

在疫情初期识别疫情严重性和采取适当行动的延迟表明，全球对埃博拉危机准备不足。如何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增强卫生系统，以更好地应对灾难性的疫情爆发，仍值得我们深思。很明显，这些国家的卫生系统需要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尤其是该地区属热带气候，其面临疾病传染率高的情况下。此外，这次疫情也凸显了早期阶段具备应急行动计划的重要性，以及设立分散的早期预警系统，以便及时地激活当地基层卫生系统和全球卫生机构的响应。应急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比如更好的卫生设施和基本医疗结构）可以帮助预防未来的危机。

从经济角度来看，抗击埃博拉的经历突显了增强应对机制灵活性和速度的必要性。当政府收入因疫情出现下降时，正确的应对措施应该是通过增加支出来抵消疫情对整体经济的不利影响，而不应顾虑到收入的下降。但是，此类应对衰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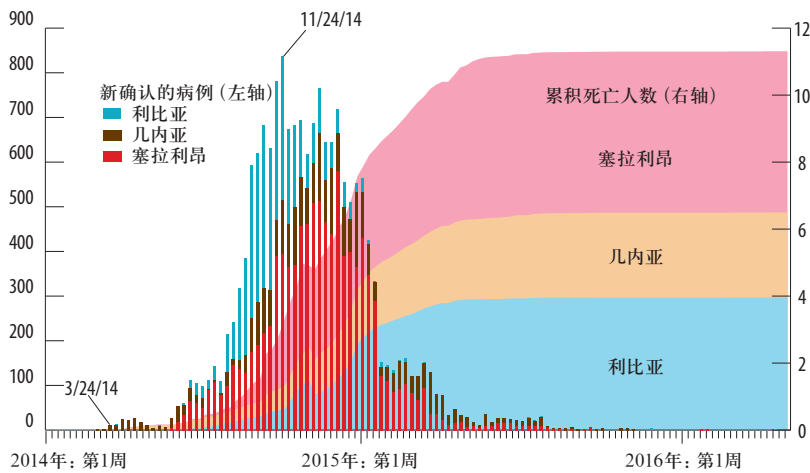
图2

### 致命的传染病

当公共卫生部门正式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时，该病毒已蔓延到其邻国，并且受感染人数开始急剧攀升。

(新确认的病例)

(累积死亡人数, 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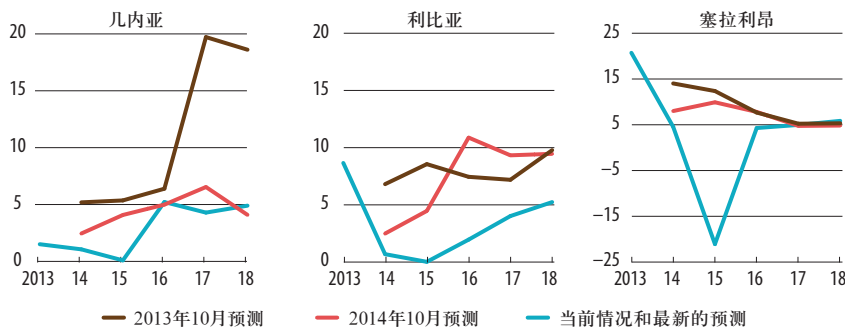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世界卫生组织。

图3

### 持续的影响

受影响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018年将向非埃博拉基线靠拢，但在疫情肆虐时期的GDP损失可能将无法弥补。

(实际GDP增长, 百分比)



资料来源：IMF工作人员的计算。

的政策需要得到快速融资的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提供快速、协调的大规模财政支持如此重要的原因。

不过，尽管全球协商和支持是必要的，但抗击埃博拉疫情的成功还是要取决于受灾国家的领导。在利比亚，正是在艾伦·约翰逊·瑟利夫总统要求各部落首领劝说其民众放弃传统的丧葬习俗之后，该国的疫情才开始出现好转。另外，强有力的领导还能帮助宣传安全措施和卫生习惯的重要性，因为这些安全措施和卫生习惯可以改变

当地民众的行为，预防病毒的传播。但是，在所有三个受灾国家中，民众的韧性和适应能力也是其国家政府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sup>FD</sup>

卡洛·卓勒维齐 (CARLO SDRILEVICH) 是IMF非洲部的顾问，穆罕默德·坎古尔 (MEHMET CANGUL) 和因德吉特·希恩 (INDERJIT SIAN) 是该部的经济学家。



# 自由的贸易，紧闭的大门

在《贸易壁垒：移民及对全球化的评论》一书中，作者玛格丽特·彼得斯提供了一些关于国际贸易政策与移民政策之间关系的新的事实及相关调查。她的主要观点是，无论是从长期还是从各种不同国家来看，更自由的贸易都会导致更严格的移民政策。作者既讲述了直观的故事，也列举了大量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

彼得斯的主要论述是新颖和直接的：在美国和其他相对富裕的国家，国际贸易可能会降低对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其中包括低技能的移民工人，因此企业也就不太可能去游说政府采取较宽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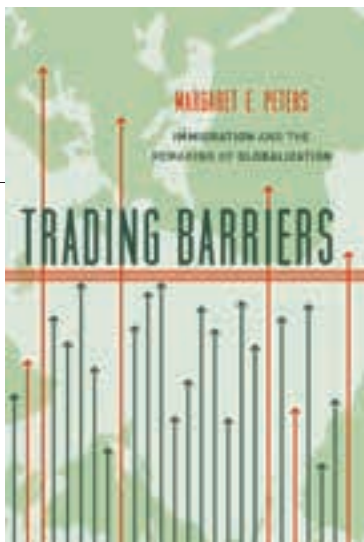
了详细说明，令人印象深刻。此外，作者还在说明中结合了交通技术进步的数据，因为交通技术进步促进了国际贸易。作者首先展示了图表证据，说明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存在着长期不一致的情况，然后表明，随着移民政策收紧，贸易政策就会放松，甚至在短期也是如此。

接下来，她设计了论证的中间步骤，表明某行业对移民立法的游说强度与该行业受到更自由贸易的影响程度相关。彼得斯主要说明了美国的情况，她首先考察了美国一个州的不同企业之间受贸易影响程度的差异，然后研究这些差异能否解释美国参议院的投票模式，结论是可以解释的，与其观点一致。

尽管彼得斯在有些地方夸大了其实证结果的优势，但是该发现在不同背景下的一致性还是蕴涵了很深刻的信息，对于那些讨论贸易政策和移民政策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同时采取更自由的贸易政策和更自由的移民政策，那么就要在二者之间慎重选择。

最后，本人想对作为本书叙述框架的经济理论提一点吹毛求疵的看法。简言之，我觉得作者可以更快地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不应该用如此长的篇幅、如此详细地描述与贸易、移民、外国投资和技术有关的多种可能机制，因为这样会最终形成不太令人满意的中间状态，一种既不能满足正式模型状态、也不能作为快速概览的详细阐述，既让学术界读者质疑其观点和所做的假设，也让普通读者觉得提供了太多的细节。

不过，总的来说，本书值得一读，它可能会给有关贸易政策和移民政策的持续争论带来有影响力的新观点。FD



玛格丽特·彼得斯  
《贸易壁垒：移民及对全球化的评论》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7年，  
352页，95美元

移民政策。所以，更自由的国际贸易直接降低了对低技能移民的需求，同时也会间接地导致反对移民的国内政策。

彼得斯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政治学教授，她在本书的开头考察了决定政治家和企业对移民政策观点的取舍因素，以及过去两个多世纪中世界上的贸易政策。为此，作者对19个不同国家（包括部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部分波斯湾国家和一些东亚国家）的政府政策进行

格雷格·C·怀特（GREG C. WRIGHT）是加州大学默塞德分校的助理教授。

# 脾气暴躁的教授

伊恩·库梅卡瓦写了一本关于阿瑟·塞西尔·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的有用指南。庇古是一位英国的经济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其前任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继任者为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本书部分是理论阐述，部分是传记，阐述了20世纪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剑桥大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凯恩斯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剑桥知识界对于将道德和道德判断用于经济学研究非常感兴趣，这来源于自由家长式改良主义的深厚传统。库梅卡瓦清晰地追溯了这种思想的轨迹，从在1914年以前的世界中通过知识和科学解决社会问题的乐观主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越来越多的怀疑和悲观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深深的痛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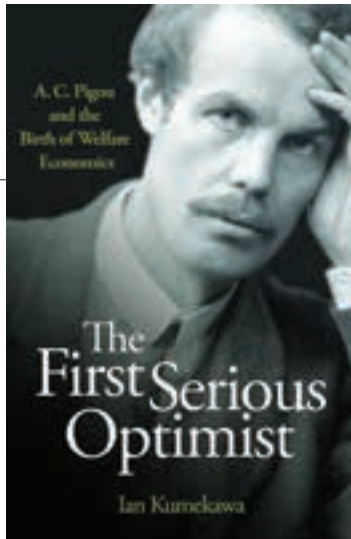
与凯恩斯一样，庇古也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他在参加战地救护车服务时经历了最可怕的战争，而且他在应征入伍时似乎也不想登记成为出

## 庇古相信大人物与善良者的共识。

于道义原因而拒服兵役者。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他从一个爱社交的快乐单身汉变成了一个越来越孤独的人。在20世纪30年代，庇古觉得属于凯恩斯的新剑桥已经超越了自己，嘲弄了自己，也忽略了自己，因为凯恩斯在自己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将其不公平地形容为过时的古典经济学稻草人，而庇古也从来没有真正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

庇古相信大人物与善良者的共识，有时甚至会牺牲自己的有力观点，比如有利于和谐的自由贸易。凯恩斯作为好斗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让庇古震惊，他认为不同意见的报告是“无教养的”。

库梅卡瓦正确地展示了庇古对于税收是处理外部性最好方法的分析，其中的外部性与今天的环境问题有关。碳税就是庇古税的一个很好的例



伊恩·库梅卡瓦

《第一个严肃的乐观主义者：庇古与福利经济学的诞生》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7年，344页，35美元

子，因为碳税匹配了生产者在污染等方面的成本。

本书并没有将庇古描写为一个值得同情的人，作者解释说，“虽然庇古打算帮助穷人，但他并不尊重穷人”，而且他“认为大多数人都完全不适合作出哪怕是最无关紧要的决策”。这是19世纪家长作风最糟糕的表现（另外庇古还有厌女症，本书中描写了庇古试图解除琼·鲁宾逊的剑桥大学讲师职位，令人齿冷）。

但出人意料的是，库梅卡瓦遗漏了庇古思想中与今天最相关的部分，以及奠定其损害控制和资源保护思想的部分。另外，与同时代人相比，庇古更深切地关心代际公平，对于一位没有子女的单身汉来说，这更令人奇怪。当代人有强烈的动机将成本转嫁给他们的后代，这一发现推动了庇古大部分福利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他在自己1932年的著作《福利经济学》中指出国家应该进行干预，因为国家是未来人的监护人。“（……）国家应该保护未来人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反对我们非理性折现的效应，以及我们对自己的偏好强过后代的效应。”这的确是一种现代思想，即使它是由一位坏脾气的爱德华时代教授所表达的。FD

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是普林斯顿大学和IMF的历史学家。

# 漂亮的比索

## 哥伦比亚在其最新的货币上展示了该国丰富的文化

娜迪亚·萨贝

“不，我并不富有。我是个有钱的穷人。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当我们问哥伦比亚作家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有关他的文学财富时，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样回答道。如今，这位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加博的著名作家已经故去，但他的头像却印在了哥伦比亚中央银行于2016年发行的最新的面值50000比索的纸币上，这是该国面值第二大的货币。

### 正在崛起的哥伦比亚

作为拉丁美洲的第四大经济体，哥伦比亚的经济在过去十年间快速增长，这部分得益于有利的人口状况以及商品繁荣。随着咖啡、石油、纺织品、电力等大量出口，以及足球明星法尔考 (Radamel Falcao) 和创作歌手夏奇拉 (Shakira) 在全世界广受欢迎，哥伦比亚正逐渐登上全球舞

台。虽然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贫困、不平等、毒品交易以及当地土著社群的流离失所，哥伦比亚正朝前发展，至少终结了影响该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武装冲突。

### 新的开端

哥伦比亚正走在复苏和增长的轨道上。该国发行了一套新的货币，以纪念那些在文化、政治和科学领域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士，包括前总统卡洛斯·耶拉斯·雷斯特雷波 (Carlos Lleras Restrepo) 和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 (Alfonso López Michelsen)，人类学家韦尔吉尼亚·古铁雷斯·德·皮涅达 (Virginia Gutiérrez de Pineda)，诗人何塞·亚松森·席尔瓦 (José Asunción Silva)，画家黛博拉·阿兰戈 (Débora Arango) 以及该国文学界的国宝级人物马尔克斯。

前哥伦比亚中央银行行长乌里韦 (José Darío Uribe) 指出：“发行新的货币是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为了纪念我国的杰出人物以及加强生物多样性，我们把这些元素融入到新版货币之中。”

### 显著特点

新版货币与旧版货币都在市场上流通，但新版货币拥有诸多显著特点，比如墨水、变色和3D安全线、微缩文字（很小的文字，用于防伪）、隐形图案、分层压制以及方便视力障碍者的触敏元素。通过采用尖端科技技术，这些新的特点增强了货币的防伪性，并满足了残疾人士的需求。

中央银行进行了一项有关新版货币安全特性的免费教育培训活动。该活动建议人们通过“看、摸、抬、卷、查”来检验货币的安全特性，并对每一个动作设定了一个对应的颜色。例如，“抬”对应的是黄色，也就是钞票如何在阳光下发生变化；“查”是指将钞票置于紫外线下进行检查。

此外，该国央行还推出了新的大面额钞票——100000比索，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收入的需求。



上图：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之父马尔克斯被蝴蝶环绕，就像他最为著名的著作《百年孤独》中的人物马乌里肖·巴比伦。

下图：20000比索正面是有3D效果的哥伦比亚第24任总统阿方索·洛佩斯·米切尔森的肖像。





2012年发行的新版纪念币中引入了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主题，每个面额的钞票都反映了该国丰富的地理资源。例如，50000比索上印有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以及一只正在吸食花蜜的蜂鸟，其中花朵图案能随着钞票的卷起而改变颜色；100000比索上印着科科拉山谷，该山谷位于安第斯山脉金迪奥河畔。该区域早在1985年就被政府列为保护区，以保护该国的国树金迪奥蜡棕榈免遭灭绝。

新版货币上的另一大特色是有关本土文化的图案，如20000比索上的祖传印第安泽努部落的抽穗，50000比索上的失落之城的梯田和泰罗纳文明。

## 胜者为王

2016年，印有马尔克斯肖像的哥伦比亚50000比索纸币从来自全球各地的18个竞争对手（修正版货币）中脱颖而出，获国际货币协会年度最安全纸币提名。

这张紫色的50000比索纸币见证了马尔克斯留给世人的遗产——他通过自己内涵深刻的文字赋予了拉丁美洲蓬勃的生机，并让全世界能一睹



上图：2000比索纸币的正面印着哥伦比亚现代艺术先锋黛博拉·阿兰戈的站立像。  
下图：2000比索纸币的背面是五彩河，用不同的颜色的墨水印刷，还有一条安全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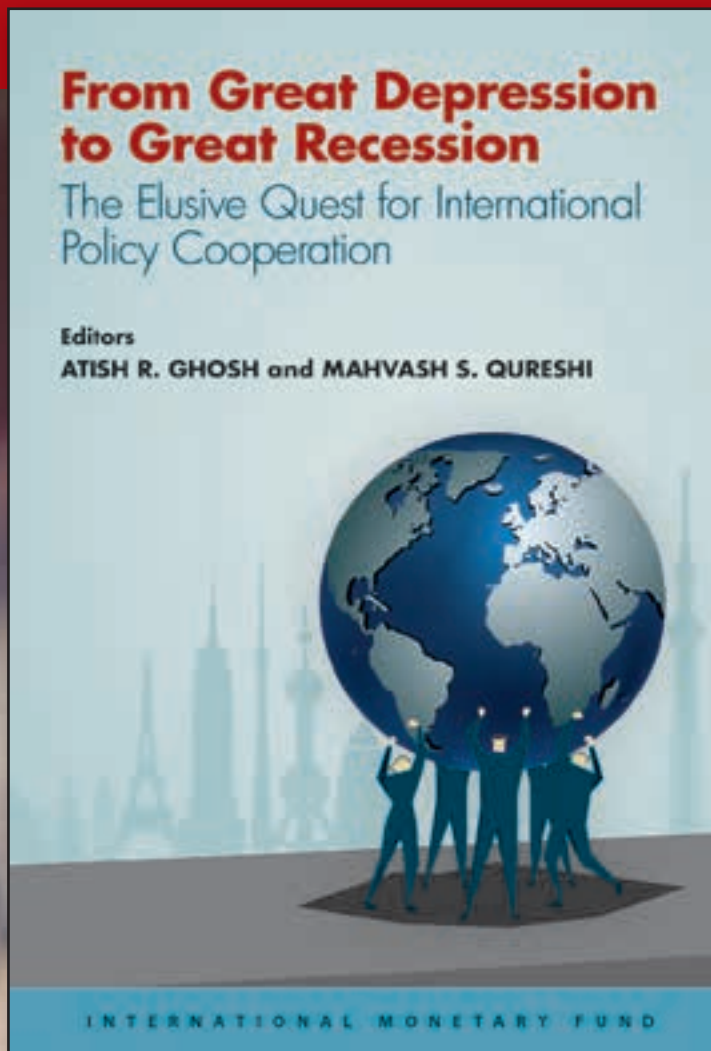
他的祖国哥伦比亚。该纸币上还摘录了一段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发表的演讲词。

人人都在热议这张“加博”钞票，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在网上输入#Gabo，你将看到无数相关的帖子，其中不仅有赞扬这张漂亮纸币的帖子，还有很多人发帖询问如何能够拥有一张50000比索纸币。

出于几年的目的，哥伦比亚发行了这套新版货币。这证明了该国正在利用其文化历史，以在未来受益。FD

娜迪亚·萨贝（NADYA SABER）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大衰退唤醒了在大萧条时期令政策制定者着迷的话题，包括调整乏力、通货紧缩、货币战争以及长期停滞。

在本书中，杰出的学者探究了历史对如今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功能性挑战的争论的启示。

本书包括以下人士所做的贡献：

Richard N. Cooper，哈佛大学

Jose Antonio Ocampo，哥伦比亚大学

Alexander K. Swoboda，国际与发展研究所

Edwin M. Truman，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Paul A. Volcker，前美联储主席

27 美元，英文，©2017，229 页，平装，ISBN 978-1-51351-427-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浏览 [bookstore.imf.org/fd617](http://bookstore.imf.org/fd617)